炎黄春秋

2002 9 总第126期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炎黄春秋

求　实　篇

1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
——《1957年新湖南报人》序……李　锐

3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黄东文

陨　星　篇

7 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吴跃农

9 忆关向应将军……穆　欣

15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吴　江

19 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曾　自

一　家　言

22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曾彦修

人　物　志

26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薛君度

28 胡适黄炎培共辟职业教育新路……陆发春

资　料　库

32 旧中国的军衔制度……徐　平

遗　闻　录

35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杨兆麟

40 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王楚英

人　海　浪

44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余焕椿

50 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殷　毅

文　荟　苑

56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傅国涌

61 王铃协助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倪怡中

他　山　石

63 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张椿年

友　谊　桥

68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高　梁

72 德国"巧克力大王"的中国情……李世隆

文　史　阁

75 钱钟书英译"毛选"……王　冰

古　今　谈

76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张国华

编　读　窗

80《炎黄春秋》编辑部约稿启事……本刊编辑部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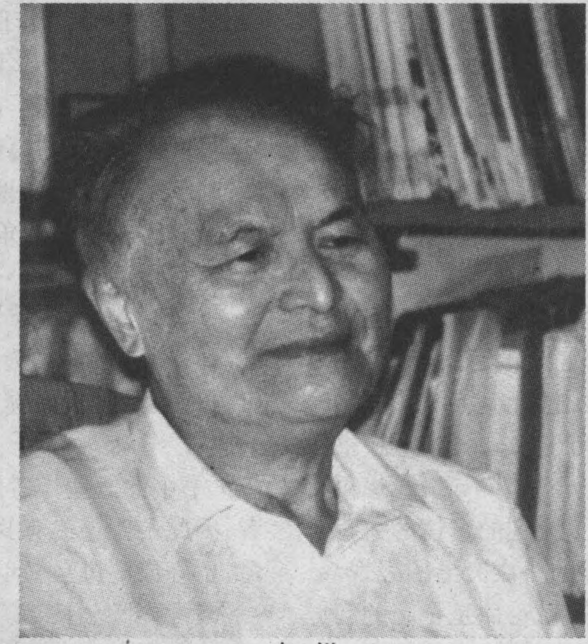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电话：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刷：丰润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 dragonsource. com
gb. dragonsource. com
www. qikan. 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 sina. 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

——《1957年新湖南报人》序

● 李锐

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些同志加入了这一支队伍。那时，长沙新闻界地下党的力量相当强大，解放军一进入长沙，即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长沙是8月5日解放的，8月15日，《新湖南报》就创刊了。报纸创刊之初，我们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经过地下党推荐，招收了一批政治素质和文化教养都比较好的青年，计140多人，经过短期的政策教育和业务训练，就让他们当起编辑、记者，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了。几年之后，其中有的人入了党，成了业务上的骨干。



李锐

就是这样几部分人：南下的、地下的以及新招收的年轻人，大家通力合作，可以说，把一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省级报纸中颇有一点名气。记得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刊述评》栏还很注意介绍《新湖南报》的情况和经验。

一年多以后，我调省委宣传部工作，离开了报社。1952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调离湖南，转到工业战线，被派到燃料工业部负责水力发电建设工作。从此各忙各的事情，同原来报社的同事，就是书信来往也很少了。

1957年发生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是谨小慎微的，专心干业务工作，外界的情况所知甚少。后来才知道，新湖南报社是重灾区。直到1979年我复职后才知其详：和我一同南下的同志、地下的同志、还有新干班的学员，都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编辑部上百个干部，划右派的竟有54人之多，都是骨干分子。比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和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两个报社划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成为当年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他们之中，有些是我很熟识的。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心一意办好报纸的好同志，有的还经历了艰苦的战争环境的考验。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他们全部属于错划，这54人中间，并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然，这不过是全国反右派斗争的一个缩影。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提供的数字，全国的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已经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了。

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是在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即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过来的。回想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号召人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坏人当作好人，错把敌人当作同志。为什么就没有说提高警惕，不要错把好人当作坏人，错把同志当作敌人呢？在反右派斗争中，小到一个百把人的新湖南报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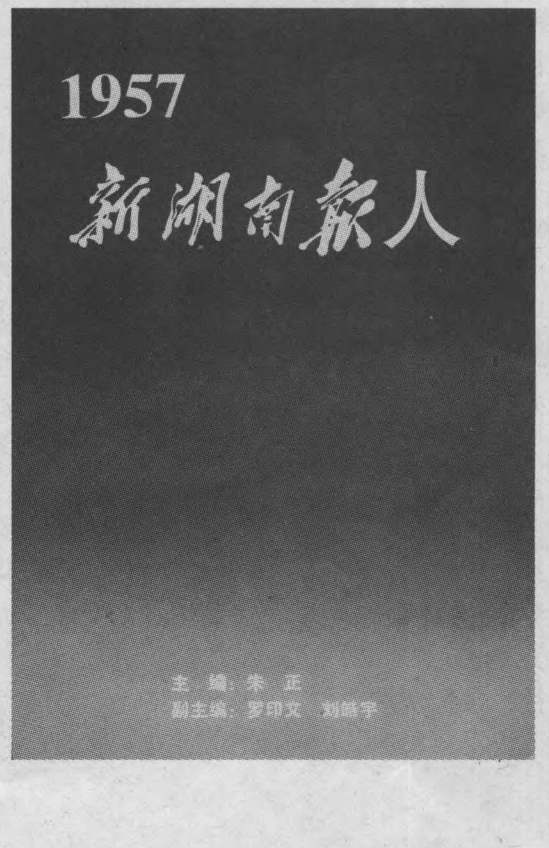
部，就把54个同志当做敌人了；大到全国，就把55万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作敌人了，这个数目等于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1/10，而且其中大都是精英啊！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当年直到“文革”十年，对为什么要那样反对并整治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应当总结其教训的，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彻底弄清楚。

1979年春，我回了一趟长沙，听了一些报社遭难的同志谈往事，为之感叹唏嘘。曾提议他们把各自的经历写下来，为这一页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使后世知所鉴戒。那时大家刚恢复工作，都以全副精力投入本身的业务，无暇及此，响应的不多。多年过去之后，大家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回顾往事，有的人也有了写出这一段经历的愿望。印在这本书里的，就是24位同志的自述和对已故者的怀念。

这都是极具体的个案。这样编成一集，读后对于当年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就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相当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感性的了解了。炮制出这个“全国第一”的大案，当时主持报社反右派的负责人当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书中的各篇都已经写得相当充分了。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书中没有怎么说到的事情的大背景。应该看到这是极左路线的一次突出的表现。它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事情，而是全国的问题。看过这些材料之后，我想，假如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报社，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右派任务，也没有可能顶着不办吧。当然，我不会去制造这种“全国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够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比如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4页），划几个右派分子交差吧。正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是极左路线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总结其历史教训了。

当然，回顾历史必须重视细节，要解剖个案。从这书的各篇里，可以看到这些同志及其家人在22年的漫长岁月中承受了怎样的苦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看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就还是只见其小未见其大了。经过开放改革20年，回头再看，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第一，反右派斗争改变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回归到八大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了。第二，实行了言者治罪。再无人敢提意见，使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没有遇到任何批评地进行。第三，把一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张，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如引进外资、干部应该懂得专业等等）都当作错误言论来批判，从而颠倒了是非，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损害了生产力的发展。第四，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平均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给事业造成长时期的损害。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得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层次来谈，庶几较接近于真实。邓小平说得好：毛泽东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可见他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分水岭的。

书中的一些作者以为，我是这书最早的倡议者，因此希望书前有我的一篇序言。我也乐于从命，正好借此机会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 黄东文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竞放晚稻高产“卫星”
各级领导走火入魔

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是从1958年夏收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开始的。这年6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嵖岈山人民公社率先放出亩产2105斤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刮起了粮食高产“卫星”的狂风。这股风刮到广东时，早稻已基本收割完毕，要放早稻高产“卫星”已错过了时机。到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媒体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省属各部门奖励了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记刘某调任高要县县委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首县、富县，是地委、专署驻地，又是全省举足轻重的几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调到高要就意味着升级。不多久，他就当了中共西江地委委员。当时，我在中共高要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干事，职务是县委调研组组员。刘某来高要后，领导安排我当刘某的秘书。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刘指定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各部、委、办、局领导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去新兴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我一同去。新兴一位县委副书记介绍情况时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我们来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割完，田头整齐地排列着已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底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大家看了，都说：“这回来参观，看后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无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交代，要我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首长在场，大家讲话毫无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我看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有！”接着，莲塘公社副书记张有才冲着我吼叫：“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我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又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看来大家把放晚稻高产“卫星”都看成是上头号召的政治任务，既然是上头布置的，下边照上边要求完成任务就行了，至于放了“卫星”会产生什么后果，谁都没有认真考虑。

次日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我立即整理好材料，请刘某过目，他看了很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

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的晚稻高产“卫星”喜报如雪片般飞到县委办公室，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晚稻大放高产“卫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省委组织晚稻创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立了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大放晚稻高产“卫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我们高要县在一片“粮食大丰收”的喜气洋洋气氛中迅速掀起了深翻改土、积肥送肥、兴修水利、大炼钢铁高潮。与此同时，全县一夜间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一平、二调、三共产”。所谓“共产”，实际上只有“上面共下面的产”，没有“下面共上面的产”。随之出现了高估产、高征购，普遍购了过头粮。还实行免费吃饭加发工资的制度，没多久，就耗尽了大队、小队的存粮和资金。1959年春节前，全县城乡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每天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0万人。办大食堂又占用了大批精壮劳动力，只留下老、弱、妇、孺投入秋收，导致大量已成熟的晚稻无法及时收割而烂在地里。春节前粮荒开始在部分大队露头，大队干部向公社反映实情，要求调粮解决。可是由粮管部门征购的粮食已入国库，公社无权动用。于是粮荒就如烈火燎原般全面爆发，变成势不可挡的灾难。

清查“黑仓”　大反“瞒产”
村干部哑巴吃黄连

高要县秋收后，一些大队不到三个月就把存粮吃完了。有一个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反映，要求解决调粮，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这使县领导感到困惑，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分析研究，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对平调粮食有抵触思想，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4200多人到会，县委进行了“查黑仓、反瞒产”动员。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他说：“高要是西江专区的粮仓，又是高产县，1958年晚稻特大丰收，怎么会秋收后不到三个月就缺粮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谁都不会相信。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搞了黑仓，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地委坚决支持县委反瞒产的决定，下决心把粮食的底子搞清楚。希望有瞒产行为的同志安下心来开好会，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把隐瞒的粮食报出来，不搞清问题就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会议一连开了三天，毫无进展。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参加大会的队干部，思家心切，好些人失眠，还有的人在睡梦中狂叫惊醒。我向刘某汇报了这一情况，刘某说：“那就好，说明大家担心不能回家过年，思想斗争开始紧张，不说不行了。”我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同我很熟，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我一听心情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他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罢。”我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找谁要去？”我听他讲的话有道理，深信不疑，马上向刘某汇报。刘某马上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长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话有板有眼，全场200多人听得十分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书记刘某强调自报瞒产粮，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的原则，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接着就以大队为单位开讨论会，果然出现了各大队纷纷报出建立粮食“黑仓”、瞒报粮食的情况。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第二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八，各公社在讨论中突然如火山爆发般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分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生产队干部自报设“黑仓”，“隐瞒”粮食1.2亿多斤。

春节后，我即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公社的同志说，“四级干部会议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因为当时已是年关，再不报个假账应付就无法回家过年，还要囚在县里整思想，当然谁都不干啦。”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到胡启满，问他“三个黑仓”是怎么回事？胡启

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瞒产。"我回到公社，杨希明书记告诉我：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召开现场会，请我也去参加。下午，我到了外坑大队，果然见晒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无人，我伸手插进谷箩去探查。天啊！原来谷箩表面一寸厚左右是真谷子，下面垫的全是谷壳！我再探过几箩，都是同样情况。说明"黑仓"里几千斤谷子中只有5%左右是真谷子，其余95%都是谷壳。禄步公社党委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笨拙的假现场呢？我想他们也是为了应付县委，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其他公社的情况也和禄步公社差不多。这说明全县在查黑仓、反瞒产运动中反出的基本上都是假材料，而且越反越假，花样翻新。放"卫星"导致高征购，高征购导致购过头粮。这样，浮肿病、饿死人的惨剧终至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饿死农民　诿过于人
弃卒保帅大抓"恶鬼"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我是其中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各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人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五一节上午，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县委工作组向我们介绍情况，分配任务，我才知道公社党委已经"烂掉"是什么意思。原来2月下旬，原禄步公社党委书记杨希明调任莲塘公社党委书记，已有一批大队闹粮荒，不久各大队普遍缺粮，公社多次向县里反映，县里不予解决。许多大队把饲料粮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连种子也吃完了，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导致社员中各种疾病大爆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病，男人则普遍患上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5%以上。这时，县委才认识到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派出工作组到莲塘处理死人问题。刚调到莲塘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始作俑者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一大批贫下中农"，两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了徒刑。调回龙公社书记王北水到莲塘接替杨希明的职务。到了7月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劳动、社员身体瘦弱以及卫生条件差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送到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抢救的病人挤得连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最可怕的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夏季流行病——痢疾。许多病人本来体质已很差，一旦染上痢疾，腹泻不止，很快就因严重脱水死去。到7月下旬，全社已有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这时，公社党委通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大会由县委工作组主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么些鬼都捉了，各种病都会好，就不会再死那么多人了！"听了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县长讲的"捉鬼"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那些躲在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的"鬼"们一个个捉出来。

下午，县长公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48人，第一名就是王北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好生活治病工作。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的撤销职务。下放干部、抓生活治病专业队被作为"鬼"捉的有两个：一个是队长陈介忠，他所驻的温贯大队，是该公社死人最多的大队，死人达大队人口的13%，他无法推卸责任，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队员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为病人熬牛骨汤时，为了调味尝了下牛骨汤，说他"偷吃病人的营养品"，被开除团籍。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全社3万多人的父母官，王北水在三个月任内为了拯救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尽了他的一切努力，可是他却被作为"莲塘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在这样的逆境中，王

北水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没半句怨言，而是接受分配给他的严酷任务：受处理后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出门，走访了莲塘的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晚上到公社卫生院同医务人员一同抢救危急病人，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公社。次日一早到伙房打一大碗白开水，吃两个咸馒头，又出门了。他这些感人事迹，许多干部、社员都是亲眼见的，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组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以及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看法。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地委认为前段高要县委对莲塘一大批干部的处理是错误的，分别恢复受处理的48位同志的党籍、团籍与职务。由于大放水稻高产“卫星”，逐步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血的教训刻骨铭心
莫让荒唐历史重演

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总结其历史教训，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内民主不健全，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权利被严重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坚持贯彻这个原则是党维持旺盛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在执行这个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三项，对正确与错误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唯独“个人服从组织”这一项往往由于书记以“代表党委”的名义，对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三年困难时期高要县一次处理200多名社、队干部，就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力恶性膨胀，不受党委约束，严重违反党章，践踏党员基本权利的典型例子。

其次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制订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国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的基本保障。当时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三章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房屋不受侵犯”。可是在公社化高潮中刮起的“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把农民的房子拆了作肥料，把农民养的牲畜没收集中办大畜牧场，把农民的家具、厨具没收办集体食堂，使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当年“高产卫星”过秤时的情景

三是缺乏群众监督，民意得不到应有尊重。在“三面红旗”已造成严重恶果，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修正错误，稳定农业生产关系，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时刻，上面仍一意孤行，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使“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续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原是让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领导畅所欲言反映“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农民要求纠“左”的呼声。但谁都不会料到，原本纠“左”的会议突转“反右”，反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接踵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践证明，要维护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建立民意机构，健全实践民意运行机制，认真尊重民意，切实实行群众监督。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 吴跃农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1949年12月，董必武率团来到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向四千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各方面都急需钱，但对留用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给饭吃，给工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党提出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号召。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一年之后，学员学成，按因才致用的原则给这些人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成了各行业的骨干。

董必武

董必武在南京，还专为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作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首先重申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指出除我们已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和一支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他强调，这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他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对象仍然是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阶级、很好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仍然是朋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及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他说：“我们一定要把革命的对象缩得很小，把我们团结的对象尽量扩大。”当时，党内有些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认为“我们打了这样久的仗，为什么现在反而把人家捧得这样高？”董老针对这样的糊涂观点，在报告中批评了因为胜利而瞧不起党外民主人士、轻视统一战线的关门倾向，他指出，“不懂得很好地建立统一战线，党的质量也就不能算高。”

董老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面前不能妄自尊大。”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民主人士开会之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轻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董必武担任常委，负责第四小组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小组的成员共有25人，大多是民主人士。董老与他们反复开会研究，还广泛征求了没有参加小组工作的党外专家的意见，才写成政府

组织法草案初稿。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相识,董老要他留在党外发挥作用。1949 年 9 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专门到锡拉胡同董老家拜见董老,董老很高兴,与他双手紧握,久久不释。董老对他说:“我详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方面得知你近年来在汉口和上海的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所做不到的。当时不同意你到延安,而留你在白区工作,是对的吧!”

不久,杨显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老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争取参加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杨显东参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陈云、薄一波对他说,“你是棉花副部长,把棉花搞上去是你的责任。”在政务院会议上,周总理也对他说,“你是棉花专家,一定要把棉花搞上去。”他生怕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在农业部欢迎他到任的见面会上,一激动他脱口而出,说,“20 年之内,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董老知道后,专门找他谈心,说:“中央没有做出决定的事,我们都不能随意说。你讲 20 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是没有根据的。讲话要考虑话说出去会引起什么作用,解决什么问题?”董老的批评,使这位党外副部长感到终生受益。

董老处处对人尊重,总是想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心情舒畅,显露才华。有一次,他让秘书把一个工作报告送给党外负责同志审阅,特意交待,有的人年纪大了,工作也忙,写书面意见不方便的话,要一一登门拜谒,记回意见来。意见反馈回来了,董老特别高兴,对工作人员说:“修改意见我仔细看过两次,绝大多数都可采用。”张奚若只改了一个字,董老说:“这不是一字之师吗?”

朋友情,心中诗。解放前,董老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常常以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1949 年 3 月 18 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 20 余人到达北平后,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老立即作复,曰:“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析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黩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爱国侨领陈嘉庚侨居新加坡,艰苦创业,经营橡胶业,获利后不自封殖,领导侨胞,热爱祖国,斥巨资创建集美学校,逾四十年。全国解放后,“陈君亲回梓里,将中小学、师范及诸专科学院修复而恢廓之”,又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952 年 12 月,董必武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时,特“集杜诗五言句六章”以纪其事,赞扬陈嘉庚“子负经济才,风雷飒万里。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董必武广交党外朋友,问寒问暖,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1955 年,谢和赓、王莹从美国回到祖国,一路上波折重重,暂寄居北京招待所。董必武接见他们,见他们没有穿大衣,便关切地询问:“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老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记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60 年代,王莹写出了长篇小说《宝姑》,并着手创作《两种美国人》。有人认为王莹应该写工农兵,董老知道后,说,王莹目前身体有病,不能到基层体验生活,怎么能期望一下子就写出工农兵题材的东西?应该实事求是,先把已有的两三种初稿和英文译文的《宝姑》和已有生活经验的《两种美国人》完成以后,等健康允许再深入生活,有了生活积累之后再计划写工农兵题材的作品。在董老鼓励关怀下,王莹消除了顾虑,按照原定计划写书稿。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两部书稿写成了。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老的夫人何连芝,表达对董老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在“文革”动乱之时,董必武没有回天之力,痛苦地在书房反复书写“群言堂,群言堂”。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高山流水,伯歌季舞。董必武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民主作风。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忆关向应将军

● 穆 欣

自幼反对殖民侵略
弱冠走上革命征途

今年9月10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关向应同志诞辰100周年。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困的满族农家，原名关致祥。他的家乡“关东州”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日本侵略者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尤其使他痛恨。他在《自传》中说：“我十二岁时入日本办的专以教育中国人的普通学校（初级小学），四年毕业。后复入大连公学堂（高等小学），二年毕业。我在这六年中所受教育完全是侵略式的教育，书报都看不明白，国内的情形一点不晓得，思想完全是奴隶的。当我毕业后学堂就把我送一日本商店服务，才作了一个月，因与日本人冲突就辞了。”宁肯回家种地绝不受日本人的欺辱。他说：“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骨气！”

他在大连公学堂读书时，常在学校发的日文课本书眉上批写“中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这样的字句，画一些丑化日本侵略者的漫画，抒发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心情；他还参加了反对日本教员殴打中国学生的罢课。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做工时，又率众“教训”了辱骂中国人的日本殖民者，迫使此人当众道歉。他愤怒地说：“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

泰东日报社是关向应接触进步书报、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在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3月，经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大连市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这年5月，他随李震瀛到达上海，帮助先期到达上海的陈为人从事革命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学习。9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向应临行前写给叔父的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1925年1月，他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命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区委工作。当过厨师、印刷工人，卖过报，忍饥耐寒，把省下的钱充作组织的活动经费。他深入群众，诚恳待人，青年们都愿意接近他，亲切地叫他“小关”。这年7月，他以共青团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济南，自此直到1927年5月，他历任共青团济南、青岛和山东省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杀人如麻，被称作“混世魔王”。全省形势严峻，关向应不畏艰险，深入各地与敌周旋。他依靠党团员把被敌人摧毁的组织重建起来。经过半年时间，青岛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团的组织。1926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回到上海。到夏天，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形势有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中央再次派关向应回到山东，负责党和团的领导工作，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

之一。但到 1927 年初，关向应再遭张宗昌通缉，不得不又一次离开山东回到上海。

从 1927 年到 1929 年，关向应继续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27 年 4 月，他前往武汉参加 5 月中旬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参与领导各地职工运动和青年工人、学徒的斗争。他在武汉积极组织纱厂工人罢工，很快取得了武汉童工八小时制的斗争胜利。其后，他被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关向应

1927 年底，关向应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协助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任弼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共青团，纠正了当时团内思想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1928 年 6 月，关向应作为共青团组织的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团中央在大会上发表祝词。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7 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局书记。关向应还参加了 7–9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并于 7 月 28 日在会上发言，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9 年初，关向应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建立了团中央的各个工作部门，先后在上海出版《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等青少年杂志。这一时期，关向应为加强共青团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白色恐怖险象环生
巧妙斗争与敌周旋

30 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的“左”倾急性病逐渐发展起来。1930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曾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关向应任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并于 8 月初被派往武汉工作。

这时武汉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形势非常严峻。党派到武汉工作的 30 多个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捕被杀。关向应同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于 8 月 6 日到达武汉后，第二天即召开长江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汉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等 7 人为委员。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处处碰壁，原定的行动计划一一破产。直到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决议后的布置是错误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立即指示长江局停止武汉暴动。周恩来派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长江局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 9 月 2 日到武汉后即传达中央指示，调整各方面力量，长江局缩小至三人，关向应被派往湖南指导工作。不久，长江局遭到破坏，他又回到武汉和任弼时一起留守长江局，坚持工作。

到 1930 年底，武汉形势更加严峻，12 月 17 日，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要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 24 日前到沪”。因工作紧张，他们一时不能脱身。12 月下旬一个晚上，他们正在开会，叛徒指引特务直扑长江局。关向应等闻讯急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情况如此险恶，关向应、任弼时等只好离开武汉，于 12 月底回到上海。

其间，9 月下旬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在上

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关向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关向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此以前，关向应已在 1930 年 2 月军委改组时，担任了军委常委，同年 3 月周恩来离沪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于年底回到上海后，仍在中央军委工作。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关向应在会议期间亲见王明等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同意这些做法，会下他与贺昌、任弼时常到龚饮冰家里，议论共产国际插手改组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做法，尤其看不惯王明那种狐假虎威的作风。王明等人不满意关向应这些表现，会后他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被调往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

这年 4 月，上海职工联合会的机关因被叛徒出卖遭敌人破坏。刚来工作不久的关向应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在敌人审讯时坚贞不屈，化名李世珍，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被敌人从他家里抄走了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单会使他的身份暴露，且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为此十分着急，即让中央特科陈赓迅速营救。

陈赓先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去找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探听情况。得知关向应确未暴露身份，英国人对这批文件很感兴趣。但因文件多，英国人中文水平低，天天围着它发愁；国民党想把这批文件弄走，英国人不同意，兰普逊正想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

周恩来指示，营救就从这批文件入手，设法抢出重要文件以免泄密，也使敌人无法判定关向应的身份，便于营救。陈赓就派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作为杨登瀛手下的“专家”去“帮助”兰普逊识别文件。刘鼎仔细检查了全部文件，将重要文件藏在身上带走。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英国人：被捕者是个学者，这些文件都是学术资料。英捕房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转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龙华监狱。

被关在这座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成立有党支部，男监的党支部由刘晓、陈为人、谢宣渠组成。支部将关向应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平庸无为。国民党因未捞到那批文件，也以为确非“要犯”，对他并未注意，所以始终未被敌人识破。周恩来得知此情，即让陈赓加紧营救。陈赓就将此事交给曾任特别营救部长、已调到情报科的黄慕兰去办。

黄慕兰经过孙晓村的介绍，找到法租界的青年律师陈志皋。陈是沈钧儒的弟子，思想进步。他的父亲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 18 年刑庭庭长。他的姨父、舅父都是法官。他的家族在上海司法界拥有很大势力。经过陈氏父子热心奔走，这年年底终使关向应无罪获释。

关向应出狱后，中共中央指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这年的 11 月当他还在狱中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艰苦坚持湘鄂西苏区
全力创建晋绥根据地

1932 年 1 月，关向应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红三军、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从洪湖到湘鄂川黔苏区的极其艰苦的 4 年间，关向应和贺龙率部转战不息，对红二军团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关向应到达以前，湘鄂西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政策干扰下，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1932 年春，红三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艰苦转战，于年底到达湘鄂边境。这时“左”倾领导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错误地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特别是实行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使红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关向应初到这里时，为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深入连

1935 年 8 月，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沣县后，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左起）、王震（前）在一起

队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织党支部，成立政治部，制定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他平易近人，工作深入，几乎认识红三军的所有战士。在生活上，他和战士一样身穿破衣，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深得全军指战员的爱戴。

1934 年 10 月，红三军在黔东和由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经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此后，经过一年奋斗，纠正了湘鄂西根据地在肃反、建军、建党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 年 11 月，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于 1936 年 7 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的甘孜会师。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长征过程中，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朱德、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他们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 1936 年 10 月间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军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关向应在内的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表现了拥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和维护党内团结一致的原则精神。

抗日战争中，关向应任第一二 O 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和贺龙师长共同创建了晋绥解放区，并和贺龙一起率领部队转战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战斗足迹遍及华北各地。

关向应是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擅长于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从 1932 年到他逝世前的 15 年间，贺龙在各个部队担任司令员时，关向应始终同时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曾说，他一生遇到两个好政委，一个是周逸群，一个是关向应。每当谈到部队的战斗经历，尤其是在谈到指战员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的时候，他从不忽视政治委员关向应的作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二 O 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的时候，贺龙对军史编写人员说：“关向应同志的作用要好好写。他在晋西北建党，发动群众，做新军的工作，牺盟会的工作他也要做，还要做一二 O 师的工作。”

关向应同时又是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从湘鄂西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到晋绥边区和冀中根据地历次反“扫荡”，他始终和贺龙共同指挥战斗。正如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他们始终在一起“入死出生”，“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他们共同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尤其是 1939 年 4 月在冀中平原进行的第一次大兵团运动战——歼敌 700 余人的河间齐会战斗，9 月全歼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三十一大队 1200 余人的灵寿陈庄战斗以及 11 月初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

团长阿部规秀的涞源黄土岭战斗，等等，都是载人史册的重大胜利。

1940年6月日军对晋西北进行夏季扫荡时，前来访问的诗人萧三随贺、关的指挥部行动，亲眼看到贺、关共同指挥部队作战的情景。他在《贺龙将军》一文中写道："夜深了，值日参谋进来报告：××队伍到了××，来电话请示。贺龙说：'我自己去讲。'步出房门，大声叫：'向应！来谈谈。'他们两人同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师长拿起电话筒说话。也许是对方不大懂他的湖南话，关向应同志接着说下去。我听见关政委吩咐得那样仔细，那样具体，指示××队伍如何如何行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贺龙同志站在旁边，一切都无异议。我因此相信'小关'（很熟悉的老同志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他自己也说过：'是吃的这碗饭啊！'"

关向应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周密细致，在军事指挥上尤其注意缜密考虑，一丝不苟。他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一次，八路军在晋西北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联名给前方连拍两个由他起草的电报中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人立即增援报复。因为部队已经有了准备，就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损失。

他还经常研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役与战术问题，认真总结经验。1939年6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易家庄，曾以《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为题，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对冀中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继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冀中的民主、民生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年8月，他又将这些论断加以发挥，写成《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等等，作了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先后在冀中《新长城》和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他在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二O师在晋西北》、《再谈晋西北的问题》等，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向应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功绩。抗战初期一二O师刚到晋西北，他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同时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面坚持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参加创建根据地工作。关向应亲自带领从部队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分赴晋西北各县和大青山地区开辟工作。工作队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群众合作抗日，建立群众组织，恢复抗日政权，发展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初步基础。1938年9月，关向应回延安出席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其后又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兼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关向应还十分重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关心文艺工作的发展。1940年3月，他在晋西北第一次戏剧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解决了晋西北根据地戏剧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引导晋西北戏剧运动健康地发展。同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方向，对于晋西北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他都具有远见卓识，提出的见解，澄清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许多糊涂观念。1940年5月4日，在晋西文联成立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有关政策问题。他本人热爱文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始建于红军时代的一二O师战斗剧社，从湘鄂西苏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始终得到关向应无微不至的关怀。剧社每上演新剧目，从剧本创作到表演排练他都提出很好的意见，耐心地帮助剧作者和演员推敲修改。这个剧团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成长，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爱，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像导演成荫、欧阳山尊，音乐家时乐濛，女作家莫耶，等等，都在全国文艺界享有盛誉。

与病魔苦斗整五年
临终仍想为党尽力

关向应家境贫困，自幼经受饥寒折磨。参加

革命后，长期繁重的秘密工作和异常险峻的战争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就在上海罹患肺病，战争年代经常犯病。在晋西北和冀中多次发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不肯医治。1940年秋他终被重病击倒，党中央、毛泽东要他速回延安诊治，直到11月才回到延安。不久得知敌人对晋西北进行规模空前的冬季扫荡，思念前方军民，使他坐卧不安。1941年初他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回前方的山西兴县，又日夜操劳，战斗不息。有次接连开了四五天会累得吐了血，由组织上强送军区医院疗养。他虽重病在身，仍不停地阅电报、批文件，向贺师长提出各种建议，致使病情恶化。10月初，贺龙亲自送他赴延安治疗。

在延安治病期间，他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密切配合医生的治疗，坚决同病魔作斗争。

在病榻上，关向应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不停地思索着党和军队的大问题，这对病情很不利，医生和同志们劝他不要这样。他说："20几年已经养成习惯了"。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把有些事瞒着他。这也不行，他总能知道。他对医生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1945年在延安举行了党的"七大"。关向应曾经表示：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代表大会。无奈他的病情在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4月24日，他在大会开幕第二天，送交大会一封向全党告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46年1月，他的病情一度转重。连续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自知病已危险，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很担心，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这次危险度过后，他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获得胜利一样，异常高兴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的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

1946年5月底，他的病情变化，嗓子疼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喝口水都疼，说话困难，不断冒汗。特别是肋膜开刀以后，疼得无法睡觉。他始终咬紧牙关忍受，没有呻吟，毫不畏惧。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到二十年。"以后他的左肺完全萎缩，右肺将近一半坏死，他依然不颓丧。最后发现左手浮肿，他又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

他就这样顽强地同病痛搏斗了整整五年，直到停止呼吸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继续为党工作！"不幸，他于1946年7月21日22时停止呼吸，溘然长逝，年仅44岁。

关向应的逝世引起全党和广大军民的哀悼，延安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朱德、任弼时等为关向应执绋；延安和晋绥边区都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对关向应毕生革命的不朽功勋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题写的悼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悼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任弼时沉痛地写道："你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你的优良作风与伟大功绩，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追念，在你长久的艰苦奋斗中，你损坏了健康，以致久病不治，壮年逝世，这是党的不幸，人民的不幸，也是作为老战友的我个人的不幸！你未竟的事业，将由全党同志来继承，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责任编辑 林 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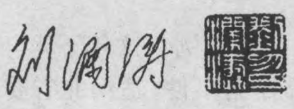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 吴 江

马 克 思 名 言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以此赠与 吴江 同志共勉



一九八九年 三 月十二 日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同志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连同他逝世时所发的"生平"及有关纪念照片等，我都作为重要的遗物保留着。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一种特殊的心声。

我认识刘澜涛是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土改中，地点是河北省曲阳县。那时他以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副书记、"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下乡亲自领导一个县的土改，任务是纠"左"。我则是晋察冀边区总工会的干部（1946年撤出张家口回到农村根据地后总工会已无事可做）也来到曲阳县参加土改，在刘澜涛的直接领导之下。土改时间不长，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很快进入了反攻阶段。为了集中力量，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后为副书记。这时他创办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我亦于此时调华北局工作，先在组织部，然后便接手协助编这个刊物。进城后不久协助编周刊的刘的秘书高迪亭调走了，刊物的具体编务就由我一个人操办（后增一助手，接着又设立一个办公室）。每周一期，有时出增刊，写评论，其任务紧张可知。这个刊物从1948年华北局成立时创办到1954年第一届华北局结束时停办，共出了304期。全国解放后，其他各中央局相继成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央和各中央局都共同利用这一党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直接向这个刊物批送需要印发的中央内部文件。所以这个刊物的发行面曾达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包括军队在内。

鉴于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向全党提出绝不骄傲自满，绝不准搞贪污腐败（慎防"糖衣炮弹"袭击），这两条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当时全党高度谨慎，号令统一，生气勃勃，确实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我逐渐了解到那时党内人际关系是"组织原则"第一，个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如老同事、老部下等）是有的，但除工作关

系外，绝不讲个人私情，实际上亦无个人友谊可言。人们好像都被装在一架机器中，一律按机器的确定程序运作，因此，所谓“螺丝钉”的说法是既真实又形象的。进城后，刘澜涛成为华北局第三书记（薄一波第一、聂荣臻第二）。薄一波后来将主要精力转到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第二把手协助陈云处理国民党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所以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达到盲从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更不在下属面前议论任何人事。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秘书的任免完全由组织部门决定。在工作上，保密更是他的绝对要求。这里我可以举出1951年遇到的两件事：

大概是1月份，山西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讨论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刘澜涛前去参加，带我同去。抗日时期我曾长期从事农会工作，土改后离开农村多时，此时我也颇想了解一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我列席以王谦为书记的长治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其时，长治地区正将互助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试办一种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高级互助组”（当时还未称“合作社”）。土地入股，当然是直接改变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了。我对此颇感兴趣，因此花了几个钟头专听王谦谈这个问题，并整理出了一份较详细的材料，分送刘澜涛、省委书记赖若愚及王谦各一份。按组织原则老规矩，我未询问刘对此种做法有何意见，他也闷不作声，好像没有看到这份材料似的。事后，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个《把老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到了该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了。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处理此事，刘表态反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并发了专电；不想山西省委竟对此提出抗辩，也发了专电。这样的事在党内还是少见的。不久毛泽东回京过问此事，他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命陈伯达起草一份中央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把“高级互助组”称为“初级合作社”（我至今认为，试办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合作社”并没有错，错是在其后搞了“不断革命”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由初级合作社很快转为高级合作社，又将小社并为大社，合一个村、一个乡为一社，此后更一发而不可收拾，高级合作社又转为人民公社，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就闯了大祸了）。在中央肯定山西省委的做法后，华北局即将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调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听说王谦同志仍健在，我在这里顺便向他致意）。在这事件的过程中，刘澜涛自己和华北局对此究竟表示过何种态度，中央的分歧意见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解决的，他从未向我透露一个字，我当然也未向他问过一句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的。

再举一例，这年下半年河北省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适河北省委召开党代表大会，刘澜涛又派我前往出席这个会议，并且指定要多参加天津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并至少隔日向他写一个报告。但刘、张事件本身却对我绝对保密。其时刘青山养病未出席会议，天津地委代表团由张子善率领。据我观察，当时河北省委对刘张案件也不知情（后来知道刘张案件牵扯到省委的某些人），我记得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曾有人对我隔日向华北局写一个报告有微辞。会后返回北京，刘即命我整理刘张案件的资料并准备为《人民日报》撰写专论，这时我才知道中央已对刘张案件作出最后决定。而派遣我去参加会议却把我蒙在鼓里这件事，刘澜涛事后却从未向我提及过一句。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结束，《建设》周刊停办，我提出变动一下工作的意见，不想此后连续发生一系列变故。各中央局结束后，中央又设立几个地区工作部管理原属各中央局管理的地区。刘澜涛任华北地区工作

部部长，又负责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此时邓小平调来中央工作，先任中央秘书长，刘澜涛和胡乔木任副秘书长。此时，他还任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董老为主任）。不久，1956年召开著名的党的“八大”。大会后中央设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刘澜涛、杨尚昆和胡乔木任候补书记。此时，刚成立不久的几个地区工作部改为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四个办公室，刘澜涛兼任第四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中央管理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三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我又留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初时工作较少，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写我那本题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的书稿。

“八大”后刘澜涛因工作过度劳累，突然发病。1956年下半年决定赴广东从化这个著名疗养地去疗养。刘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他要我同去，说“你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那里去写书”。这样我也就到从化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不住在同一住所，不在一起用餐，我又埋头写书，所以这时双方见面说话的时候仍不多。

一天晚上，刘约我到他那里去吃饭，这次似乎是有意谈起写书和搞理论的事，这是我在华北局结束时向他提出的话题，他知道我有这个愿望。他首先说，理论很重要，他自己因为理论水平不高又缺少时间读书，所以工作很吃力。他又说，“你有兴趣搞理论我赞成，回北京后看工作情况再定。”最后，他说，“我送你两句话，怎么样？是《红楼梦》里的，你一定知道。”他就念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来。我说：“澜涛同志的意思我明白，这两句话恰可以作为对我的针砭。我知道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政治，只是在澜涛同志身边这几年，明白了一些事情。”他说：“你不是不懂政治，当然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写文章没有脱离政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你是做到了的。”经过这次谈话，我知道我想转行的事实际上已得到了他的准许。

回到北京以后，机会果然来了。1957年初，书记处四个办公室宣布结束，干部另行分配。那时正是刚要进行“反右”的时候，我们的机构既宣布结束，“大鸣大放”自然不搞了，因此也就不抓“右派”了。这就是说，我们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夏季那场大风暴。人不抓我，我不抓人。只记得除报纸上所见外，我曾一个人跑到人民大学的大礼堂去听了一场林希翎的演讲。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只出了一个“右派”，那是一位刚好调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同志，他是在党校里不幸碰在枪口上的（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

我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接近尾声时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去工作，1959年末又转到《红旗》杂志社。而刘澜涛则于1960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这已是第二届中央局了）。从此分别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又在北京重逢。那时我已在中央党校工作。这次重逢恍如隔世，好像大家都到地狱里去转了一遭又重返人间。“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其所受迫害之严重可想而知。特别是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这对于他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的打击。他默默地承受着一种彻心的痛苦。这里顺便提一下：刘澜涛夫妻两人竟是同月同日同时死，相隔30年。其夫人死于1967年12月31日上午，刘则死于1997年12月31日上午，这也算是一件奇事。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先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这时他曾专邀我为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经过，他对这场讨论高度评价，并说他们案件的平反亦得这场讨论之助。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他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为邓小平，后又是邓颖超）。此时我也由原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特别令人感觉到的是：这时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时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他不像别的离休领导人那样愿意写“回忆”，他不想写任何回忆的东

西，不止一个人劝他，我也劝他，他都表示不干。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和他的秘书在深谈中逐渐弄明白，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特别是被他伤害过的同志多是西北地区的同志，而他自己偏偏也是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地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内心仍不免耿耿于怀，而且即使表示谅解的同志无形中也仍有隔阂，刘为此深感痛苦。

不过这里我要用事实作点说明：刘澜涛不是只搞“左”而不反“左”的人，只要中央提出反“左”，他同样是坚决执行的。这除了我亲身见到的1947年刘澜涛纠正土改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件事是：1941年刘澜涛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时，还曾解救过一个被某地委错判为“国民党特务”的青年知识分子，说那是“违背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这个青年朋友蒙冤的事件我在当时就知道，至于刘澜涛直接出面纠正这件错案，我却是在“文革”以后，从当时曾是该地委宣传部长的胡开明口中才听说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重视他赠送我的马克思那几句话：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过去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从未感觉到友谊的重要、个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他所要求的第一是“组织”，第二是“组织”，第三还是“组织”，而“组织”就意味着“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嘛！在他的头脑中好像充满着严密组织的集体细胞，而没有单个因子。除自己的家庭生活外，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名言的原意，革命组织也是由个人所组成，个人自当遵守组织原则，但组织也应当尊重个人，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要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每个人应有提意见、讨论问题乃至保留意见的权利。一句话，要有党内民主，尤其在脱离秘密环境和战争环境之后，党内民主更显得重要。革命组织内部的友谊，只能由党内民主和互相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与应有权利来培养、来保证。共产党人归根结底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末，其自身自然应当找到一种能将组织原则与个人自由发展结合起来并求得两者间平衡的办法，否则，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党内生活的。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包括缺乏真正的友谊和彼此整来整去），可以说大都与缺乏党内民主有关。

我不知道刘澜涛在其最后年月的内心反思和在其日益增长的孤寂感中渴望寻求友谊，是否由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仅仅是一种善良的直觉？这我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即使最后几年我们之间也无法深谈，现在则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责任编辑　洛　松）

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

· 曾自

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靠祖父经营一家小药店生活。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3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天资聪颖的父亲,更成了祖母的宝贝,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儿子身上,6岁便让他进了私塾,后又送他进城北小学。没有文化的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一些古诗词。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1939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曾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父亲9岁时祖母死了,哥嫂强令父亲辍学,他当了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抓抓匠"。

父亲自己生活孤苦,情感上更加同情受苦人。旧社会四川的叫化子不光讨饭,还有讨药的,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起来倒给人家。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整治老板的事。他把从钱箱里偷钱叫做"就地取材"。办法是把膏药抹在竹棍上,然后用棍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他在自述中说:"在我12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曾做过作家梦。他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见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他的同伴回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13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

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至1937年11月他去延安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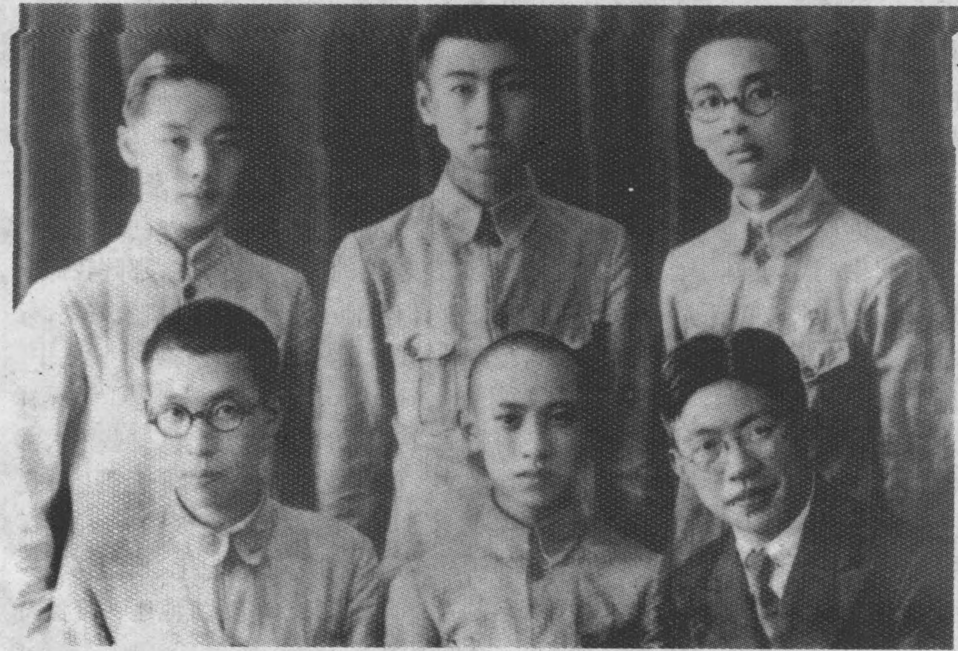
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在这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

父亲不断地写,他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窗》,《帘》,《井》,等等:“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读者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但是有谁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1937年,田家英奔赴延安前和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同志合影(前排中为田家英)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又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创办同仁刊物《激光》。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刊物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怀念》和《手》。其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

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强烈表现了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第一期刊物居然卖掉200多份。《激光》后易名《散文》，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书讲述的一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瞒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拷：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拷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几年前，李鹏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读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在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无异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自白，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告别。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16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责任编辑　洛　松）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 曾彦修

一

四年前（1998 年 7 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 1940 年 2 月 20 日延安《解放》杂志）。张在作了大会报告的三个多月后，即同年 4 月 20 日，也在《解放》杂志上把报告全文发表了，题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文中提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我在文中说：“59 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还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 10 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该文更提出，“历史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此文发表已近四年了，有何反应，我不知道。但今年四月出现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题名《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一点辩证》，作者辛岩（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四期）。文中批评了我的观点，但没有点人名，也未指明文章的出处。经友人查明该文所用引文是来自拙文，才弄清楚是批判我的文章。

批判文说：“近年来，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指《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了严重的指责，说毛泽东对民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所主张的是‘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他说（他，指曾）：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评曾文画龙点睛之处是结尾的话：“断章取义，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贸然得出毛泽东、张闻天在进行文化问题上的两种方向的斗争（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严重的政治结论。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这种学风是不是应当提倡，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这段结论的一些语言，恐怕有些同志还很熟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出自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而“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则是出自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信手拈来，都是国粹，它的效果恐怕不会太好的。

这篇批判文章的一条最硬的材料和理由，是说 1939 年 12 月 13 日在张闻天主持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看来是专门讨论即将召开的边区文代会的会议），该文据现在的《毛泽东年谱》的一段记载，毛在会上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这件历史档案材料，确实很重要，说明毛在内部会议上确曾十分明确地一度讲过或归纳出过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而不是后来删去了"民主的"特点的三化。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这一段引文说明了什么呢？它十分明白地说明了：

第一，包括"民主的"方向在内的"四化"是对的，毛开始在内部不但是赞成的，而且有可能是由他归纳而成的。

第二，过了四五十天，经过毛郑重重新考虑后，由毛独自一人删去了"民主的"特点，把"四化"变成了没有"民主的""三化"，而不顾会议上的共识。现在有人说，这样砍正好。

第三，张闻天十分清楚"四化"方向是政治局讨论后的共识，也即政治局的决定（它可能没有采用决议的形式），因此，他作的是有"民主的"这个特点的"四化"方向报告，并在毛《新民主主义论》的"三化"长文发表50天以后，仍毫不迟疑地按照政治局的共识，即包括具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方向的报告全文照样发表。

毛为什么要如此不顾政治局的、并且他本人归纳过的"四化"特点中，毅然删去"民主化"的特点呢？这不必去推测，中国话叫事实胜于雄辩。这里什么也不需要辩，是毛个人无条件地改变了政治局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共识。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以毛个人坚持的、解放后奉为唯一合法的"三化"说为根据呢？这里用斯大林行文中强有力的话来说便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政治局的共识错了，要么是毛的这个个人修改不妥当。批评文既然强调只有毛的个人修改才是对的，当然就是说政治局达成的"四化"方向的共识是错了。这是根本不需要"深长思之"，是人人都可判断的。

"民主化"是要建设现代国家最首要的前提和特征。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历史上具有当时相对高或很高的科技与生产能力的国家，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极端专制主义的前苏联，小到如构筑了50万座地堡的霍查的阿尔巴尼亚都一律垮了，而且垮的很惨。在这样无情但是公正的历史事实面前，民主化难道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吗？没有民主化，国家最终会得到一个什么可怕可悲的结果，历史老人已做了公正结论，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二

但是，最近也有文章，讲的比我更具体、更彻底、更明确。

《党的文献》杂志2002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人民大学副教授刘辉（女）、教授黄兴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是完全认为应该采用有"民主的"特征的"四化"论，而不应该采用没有"民主的"特征的"三化"论的。旗帜鲜明，论证丰富，不是我1998年7月发表的上述这篇浅薄文章所能比拟的。两教授都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年龄比我的一半还差几岁，我自然赶不上他们的勇气。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国全党都应该在一切方面"与时俱进"，我看人大这两位教授就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的。

两位教授的文章不短，但没有空话，此处只能略加征引。

该文说：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都习惯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那一众所周知的表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1942年以前，这一提法不仅在延安文化界，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都远非像后来那样权威。相反，当时还存在过，确切地说还曾流行过一种更值得重视、但后来却长期被忽视的提法。那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从内容上说，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乃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既然名之为'民主主义'的文化，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

分严重，反封建的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就更应如此。”

他们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大众化”不能代替“民主化”的理由。它说：

“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以‘大众化’包容和取代了‘民主化’……但是，‘大众化’和‘民主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简单的以前者来包容或代替后者，仍是不太恰当的。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表述较为清晰和严谨。”“仔细品味他（指张闻天——引者）的概述，不难发现，在‘大众化’与‘民主化’之间，实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像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就是‘大众化’的概括所难以涵盖的。另外，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作基础，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同时，这种‘大众化’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早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上引的这段话是极重要的，没有进步内容、民主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或民间形式，就常常会为极其腐败的封建糟粕所占领。我还有点印象，就在1940年2月召开边区文代会后不久，在当时的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进步文化界内部，发生过一次关于文艺的“民间形式”问题争论。争论的一方似乎是以胡风先生为首，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是否错误，我已记不得，但我有个印象，他们反对盲目崇拜“民间形式”，认为过去及现有的“民间形式”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淫荡的等等，内容并不进步，对它们不能盲目肯定。这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表现形式的大众化问题。胡风先生一派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我觉得他们的这项意见却是对的，所以印象极深。以今日而论，“文革”结束以来，小说上两个最大的“大众化”派，一是台湾传来的一大堆“言情小说”，一是香港来的更一大堆武侠小说，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人们的文学修养、道德情操、增广见闻……哪一样有多少帮助呢？它们一点也不具有多少先进性，尽管它们是相当大众化的。我较多地看过的是一些翻译的推理小说，太费脑筋了，又是犯罪教科书，但那也是相当大众化的（我得声明，对福尔摩斯侦探案无犯罪教科书之感）。所以，我明确地感到，要以“大众化”来代替“民主化”，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上述这两位教授的文章，还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即使在解放区，人们也并未通用“三化”说，而多是用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他们的例子太多，此处只能转引一点。1940年2月延安边区文代会的宣言就是用的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甚至在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的《施政要端》，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也是“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直到1946年该区出版的《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一书，在解释该区的文教工作方针时，仍然是“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可见，在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也还并未统一于“三化”之说，而且这些都是官方的法令。邓小平同志第二年在太行传达文化工作方向时，也非常正式地用的“四化”说，而且特别指明是“洛甫同志”提出的。可见小平同志是用心选择过，并且至终坚持“四化”说的。我可证明，两位教授说的是对的，即使在延安，口头上也大多用“四化”说，写文如不作征引，也习惯于“四化”说。

这两位教授的结论是：

“我们以为，无论是在表达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共识方面，它（指张闻天的‘四化’说）都明显较前一种提法（指毛泽东的‘三化’说——引者）要更为贴切和完善。因此，今后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似应该采用后一种提法（指包含民主化在内的、张闻天阐发的‘四化’说）”。

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这里明确点明“四化”论是中共的“集体智慧”。我以为，今后强调科教兴国的时候，如果不强调“民主化”，怎么能取得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呢。而且，在1939年12月那次政治局专门讨论文化工作方向的会议上，显然，“四化”问题是取得了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识

的，那是政治局的决定。事后作出重大改变是毛泽东个人未遵行集体领导的、包括他自己也曾同意过的共同决定，而不是集体的决定犯了错误。毛的修改是同我国当时及今后文教科技工作的要求不能适应的。因此，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应当恢复当年政治局两次会议（另一次会议见下节）的共识，也即由毛泽东一度接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的提法。这不是砍旗，这才是真正的举旗。对于转眼就由毛泽东改变了本人刚刚明确赞成过、高举过的共同正确决定，我们现在绝不应该继续采用“一句顶一万句”那样的盲从办法了。这种态度根本上也不符合江泽民总书记非常正确的“三个代表”的号召，没有民主要求、民主特点的文化总路线，它的“先进”之处在哪里呢？

三

延安时党中央政治局讨论文化工作方向问题的会议，看来不止一次。张培森尽十余年之力编纂的《张闻天年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它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研究张闻天本人，而更重要的是该书相当多地反映了 1934——1936 年以至于 1937、1938 年时期党中央最高层的最重要活动。而且这些资料大都是经过细密考证，采用原始档案资料编纂而成的。承编者不弃，我是在原稿时被征求意见者之一，看后确实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后来不再提起的曾担任了几年总书记的人并不是挂名，他自己也不是尸位素餐，几年间仅仅由他个人或与毛共同署名发出指示工作的电报就有几百件之多，其中不少是用“洛毛”连署的指示电。这年谱中就记载了 1939 年 8 月 23—24 日，中央政治局也曾开会研究过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上述人民大学两教授文章也引用过这个资料。由于是张闻天的年谱，编者不可能全面反映这件事，但也介绍了一些重要情况。参加会议的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等。看来，此时还只酝酿了“民族化、大众化”两个特点，会上，周恩来提出“民主化”也应在总方向之内，于是，张闻天立即响应，发言说：“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看来，政治局开始还只是讨论“文艺”问题，所以：第一，科学化问题在 1939 年 8 月时尚未提出；第二，文艺工作的方向中应该有“民主化”的方向，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张闻天立即予以响应的。因此，在三个多月后，即 12 月 13 日政治局另一次讨论整个“文化”工作的方向问题时，自然而然就是在已有的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三个口号之外，再加科学的口号。这是十分正确的、自然而然地发展形成的。所以，毛泽东决然删去民主的这一特征，是他个人推翻了他本人也参与过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制定的共识。这个行动显然不能说是正确的，更不是先进的，决然无可维护。今天我们如果仍然要无条件维护他的这个个人决定，无异于维护毛泽东从来就有不加说明地任意推翻政治局两次会议的共识或决定的权力。今天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特别需要民主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几十年那样无条件维护个人崇拜和领袖的特权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民主化的希望吗？毛泽东大笔一挥，删掉了“民主的”特点。但是谁有这个特权呢？别人有吗？毛泽东又历来强调“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这个提法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民主是广大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利。所谓“手段”之说，即一切权力均在我之手，所谓“民主”，纯是我手中掌握的一种手段，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不过是一种统治方法、统治手段、统治策略而已，与人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民主不是统治者的施舍物，而是现代国家的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力或权利。国家不民主化，如何能取得“三个代表”的光辉伟大的结果呢？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那叫现代化吗？没有民主化，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欧洲自 15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几个世纪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战以来，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了或有所成功，有些国家则失败了甚至覆亡了。这些已完全证明了民主化是现代化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没有民主化则是亡国的致命因素。

（责任编辑　仲　文）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 薛君度

我于1953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迄今已半个世纪。“积四十年之经验”,认为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新世纪,研究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要建立一个新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误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破除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各种教条迷信,个人崇拜思想,以及“以孙划线”的“凡是史学”。本“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重新肯定当年革命目的不但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且要实现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西方民主政体。不能因为后来败于袁世凯,历经地方割据、内战、一党专政、不断革命的局面和标准,书生论政,“事后诸葛”,坐而论道,对当时效法西方民主政体运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主张和平统一,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党人,就认为是软弱妥协、不够进步,似乎还要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算“革命”。这种旧革命史观和只有一个天子的帝王传统思想,很难予辛亥革命和人物有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也不符合20多年来改革开放,力求民主法治,全民利益,国家富强,和平统一的政策。

1984年3月,我在北大访问,13日,国防部长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国防部长会见文人,似乎尚属首次)。次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单独会见,畅谈两个小时。新华社报道用“坦率”交谈这两个字也是很少见的。我对胡耀邦说:1981年我和老伴黄德华应邀返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我们的感觉是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当然离不了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等于辛亥革命。胡耀邦反应很快,他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后多提黄(兴)还有宋(教仁)。”半年后,十月底北京隆重举行一个纪念黄兴诞辰大会,由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主持。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统战部预先告诉我准备发言,一再说机会难得。听过我英文演说的人都认为不错。但我的“广东官话”不成。我建议老伴黄德华发言,我代她拟一个简短的稿,她念得很好,一座动容。

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革命的启示》,作者莫路里称黄兴是辛亥革命的“真正英雄”和“领导”。1915年林百克用笔名在芝加哥出版的书《欧战期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书中只用黄兴个人戎装照片一张,称黄兴为“中国的华盛顿”。林百克是孙中山的顾问和老朋友,1925年他出版《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一书内有一章专论“孙中山与黄兴”。1915年陈其美在日本致黄兴的信,希望他早日自美东返,共商大计。后来作为《孙文学说》附录发表。首称“溯自辛亥以还,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1952年,台北重刊追随黄兴甚久,民初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1929年所著《黄兴传记》小册子时,编者加下列按语:“黄克强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勋名甚为煊赫,辛亥时代世以孙黄并称。”章炳麟挽联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但20世纪20年代以后,知者渐少。辛亥革命时代的日本朋友,于20年代就开始注意“重孙抑黄”现象,他对此很有意见。多年前,我曾经当面问过当年在大陆时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辛亥革命,孙黄并称,为什么国民党从来未予黄兴相应的重视?他默不作声。

1960年12月25日,台北《政治评论》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黄克强先生》一文,认为“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领导是精神领导

……在实际领导方面,没有可与黄先生比者。这是辛亥革命底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但是到现在似乎人都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黄先生了。”当时台湾一些著名的党外人士,亦常批评国民党这一段“官史”。

90年代,我在华盛顿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见到中国大使馆一位一等秘书,交换名片后他问我:“黄兴是什么人?可否介绍一见?”我笑一笑走开,没有答他。1998年,我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有一位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以为我是“台湾军人黄兴的亲戚”。至于以为黄公是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人就更多了。但最荒谬的莫如80年代在国内看到的一部电影,因为反袁军费不足,黄兴向孙中山下跪,请求拨款!

黄兴和孙中山两人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大不相同,为人和领导作风也不一样。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目的则一致,共创同盟会,相辅相成。黄兴,1874年生于书香之家,湖南善化(今长沙)人。22岁考中秀才,后留学日本,返国后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从事革命。他小于孙中山8岁,但早死9年,患胃充血血管破裂症,病逝上海时仅42岁。孙中山死于1925年,享年59岁。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之前,或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没有三民主义演讲的“系统”理论了,也不会有受国共两党同时尊敬的领袖地位。满清末年,梁启超说过:“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通”字可能指“海外关系”)

1912年孙中山(坐者左二)与黄兴(坐者左三)在上海行馆

孙中山与黄兴合作前,他的主要支持者只有会党和华侨。1905年两人在东京共组同盟会后,孙中山才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他自称的“十次革命”,只有一次是亲临战地:从河内与黄兴、胡汉民等坐火车至广西边境,然后步行至镇南关住了一晚。此外,从第一次广州之役后(1895年)到武汉起义(1911年)16年间,他都在国外。黄中黄(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孙黄在东京共组同盟会时,重要干部大多是黄兴的华兴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以后八次起义,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虽非职业军人,却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最轰动的1911年“三月二十九”广州之役,他未满19岁的长子黄一欧也不惜生命冒险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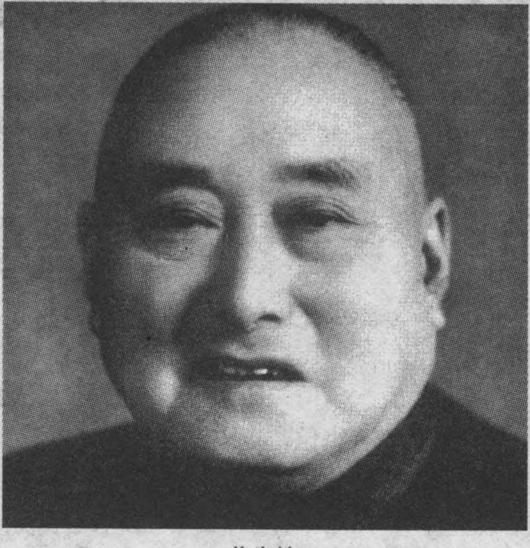
黄兴为人,自言“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不居”。从不争领导权,与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不同。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上海。孙中山单独发通告:“启者　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克强盛年禀赋素厚……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　同志共鉴察之”。(原文无标点,有空格。通告无主从辅助关系语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在《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书(台北,1956年)序言中就孙中山单独署名通告说:此事“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相得益彰,同垂不朽”。这是孙黄并称,并无后人以孙中山为主,黄兴辅助的观念。

拙著《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于辛亥革命50周年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到今不觉40年。中文版问世,也已20年,多少改变了以孙划线的史学。40年来发掘和出版大量资料,得以充实和补充我的基本观点,至为快慰。多年来我计划出版增订本,时作时缀,希望2002年底内可以定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能再拖了。

(责任编辑　仲　文)

胡适 黄炎培 共辟职业教育新路

● 陆发春



黄炎培

胡适与黄炎培都是活跃于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黄炎培早年以同盟会员投身反清的辛亥革命，又因主持江苏新式教育事业名闻全国，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最早开拓者之一。胡适则因倡导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暴得大名”，其声名一时超于黄炎培。胡、黄两人的教育主张，都曾受杜威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都看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但究其个人兴趣主旨及对社会的贡献，则异大于同。1949年，黄炎培在古稀之年，由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放弃前期单纯的教育救国理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前，胡适拒绝了中共要其留下来做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挽留，到台湾托身于蒋家王朝政权，做了中研院院长，直至遽尔归土。现择胡、黄两人早年交往片断，略作述论。

经蒋梦麟的介绍，胡适见到了“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出生地却是上海大东门外（1891年生），次年随母迁居上海川沙厅。黄炎培1878年10月出生于上海川沙厅。胡适之父胡传（铁花）与黄炎培之父黄叔才（燡林）为至交好友。胡适的高祖父早先在川沙开有“万和”号茶铺，到祖父一辈又在上海增开有“茂春”号。胡传离开绩溪上庄的私塾后，即赴川沙，一面辅佐家庭店业，同时跟随学者庄砥廉学习诗文。1865年，胡传入郡庠，做了秀才郎，但科举之道并不得志，“屡踬省试，数荐不售”，后拜学于上海龙门书院。1881年，胡传得乡友帮助介绍，远赴东北宁古塔，追随办理边防的清廷官员吴大澂帐下，在吴氏幕下奔走六年，参与中俄勘界各项军机，得吴氏赏识。1887年，吴调任广东巡抚，胡传亦随从。次年因黄河堤溃决口，吴大澂任河道总督，胡传跟随辅助督修大堤，因治河尽力，富有绩效，盛负时誉，被吴专此奏保，后朝旨颁下，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赏戴花翎，由此太平天国之战后绩溪上庄胡氏家族的衰状为之一变。

黄叔才早年勤苦致学，人道其举笔从容、为文闲雅潇洒，雍容大度，但科举之道也是不得志，仅为邑庠生。他不满足在乡中设塾授徒，转而投到吴大澂帐下。吴为广东巡抚及河道总督时，胡传与黄叔才同在幕府中做事，相互之交十分投

缘。叔才佩服胡传的学问才气，并时常在自家孩子面前夸赞。1918 年，经蒋梦麟介绍，胡适与黄炎培初次晤面，胡问及黄来京做何事时，黄炎培答称将赴东三省作教育考察。其时，黄正在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任上。胡适叙道："先君曾在吉林做官，又曾到过边界上勘界。"黄追问胡适父亲名讳，当胡适刚说出单名一个"传"字，黄炎培即大惊道："原来令尊大人就是铁花老伯?！"接着夸赞胡适，"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

值得再提的是，据后人考证：黄炎培的诞生地，即为今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的"内史第"，该宅第为清咸丰年间任过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原有六七十间厅堂房屋，因黄炎培祖母沈氏、外祖母沈氏是沈树镛胞姐妹关系，黄家租住于沈宅中。胡适祖上所开的万和茶庄，始于嘉庆年间，曾经兴盛一时。宣统三年（1911 年）川沙改厅为县治，故当地还有民谚"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一说。胡适诞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程裕新茶叶栈，约半年后（1892 年）随母亲移住到川沙，因地处中街的万和茶庄为制茶的经营场地及制革工用房，胡适随母住到相隔不远的南市街"内史第"前进厅屋转侧临街的厢房。细算起来，今日浦东的"内史第"黄炎培故居，亦为胡适故居所在。

在胡适笔下，称黄炎培为当时中国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也非一时赞言。黄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深受中文总教习蔡元培的影响，"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入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在蔡元培爱国反清革命思想启发下，黄不仅在学生风潮"墨水瓶事件"中挺身而出，后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时期同盟会在上海地区的革命中坚。辛亥时期，黄炎培出任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等要职，其后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信奉教育救国，要大力兴办把教育与生活、社会联系起来的实用教育，且笃实践履心志。江苏省教育会"自司长黄炎培受任以来，极力振兴，具见周详"，"苏教育司黄炎培干练勤敏，通达治体，主持一切具有条理"，因而名闻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黄炎培父亲黄熚林在吴大澂幕府时曾教授吴两个女儿，其中一女后为袁世凯儿媳妇。袁世凯上台后，鉴于黄炎培的名声，也想拉拢黄。袁世凯曾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但黄炎培坚辞不就。1914 年，黄炎培辞江苏教育司长职，一方面大量研读西方教育理论，同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教育考察，探索以教育振兴国家之途。他的教育考察日记在《教育杂志》及商务印书馆发表出版后，国内教育界同行为之震动。1917 年 5 月，为了实现其"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的理想，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时在《宣言书》上签名支持的就有教育、实业、政界名流蔡元培、梁启超、汤化龙、唐绍仪、马相伯、张謇、张元济、严修、聂云台、穆籍初、宋汉章、史量才、张嘉璈等 48 人。职教社是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机构，黄炎培任办事部主任，"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坚持"是为改良教育作准备"、"是替学生谋服务社会作准备"、"是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力作准备"三大宗旨，一年之内即发展有陈嘉庚、钱新之以及总统黎元洪、江苏督军李纯、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工商业、政界上层人士 37 名永久特别社员；马寅初、潘文安、任鸿隽等 549 名普通社员，以及 204 名特别社员等，人员囊括南北中国军、政、工商、实业、教育等广泛的社会关系，其影响自不待言。

黄炎培年长胡适 13 岁，扬名立道也早于胡适。1906 年，上海名士杨斯盛捐款在浦东六里桥购地 40 亩，建设浦东中学，其中的校园草图设计及各科教师选聘都是黄炎培主持的。1908 年，杨斯盛病殁时，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特别在所编辑的《竞业旬报》发表白话传记《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称赞杨斯盛由一个泥水匠，凭借个人努力，"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成了大富翁后，又做了"最为人所最崇拜"的"破家兴学一事"。只是胡适并不了解，他所推崇的"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

及”的浦东中学，正是杨斯盛所十分赏识的黄炎培实际主事努力的结晶。胡适在《兢业旬报》上极力歌颂的另一位“可爱可敬极有血性极有爱国心的”中国公学同学姚洪业（一作宏业），也是黄炎培“亲密的同志”。新文化运动初起后，胡适与黄炎培都致力于新教育建设，名声相闻，“几次想相见，总不曾见着”。他们在北京相晤之后，又得知两家竟是世交，胡、黄此后的交往，更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事业

1917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年初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逐渐取得北京文化界求变趋新人士的信任和欢迎。陈独秀又荐举胡适为文科教授。北京地区新文化之潮渐近成势，北大俨然成为新文化的大本营，由此也招致校内外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肆意攻击。以林纾为首的守旧文人甚至于笔端下恶意煽动北洋军阀以暴力镇压新思潮，新旧对垒更趋激烈。

胡适与黄炎培相识相交于此历史背景下，当时黄炎培虽然未能像北京《新青年》一班人直接与守旧派打擂相斗，但他以开拓新教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阵地，致力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把教育与救国济民相联系，“职教社就创立在利国富民的一念上”。他通过国内外大量的教育现状实地考察，认为辛亥后出现的所谓新式教育状况，都是“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这种偏向于文字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变相的科举教育。“私塾改良之结果，可以使校数骤增，而不能使教育改进。”他通过国内外教育制度和发展前景的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求学与服务脱节，所以学生毕业后，无相当的事可做。“如果教育越发达，社会将越发达，所以主张将学校与社会、求学与服务联系起来，使学校功课可以在社会应用，这就是兄弟所倡职业教育的理想。”为此，他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民主教育思想，如他接受和采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中“教育即传递即生活即发展”之论，强调教育的本质具有“职业性”，“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直接否定了中国守旧的封建教育观；而且他成功创设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取得的硕果，又从实践上提供了以新破旧、以新代旧的新教育榜样。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所要解决的并非是狭义上的个人谋生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中国文化的大问题。“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新文化的建设，不仅是文字改革，旧伦理道德被打破，妇女的解放等，关系千家万户子弟成长的教育改革理当为其中心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及其实践，正是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深化。

就胡适与黄炎培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新成果来说，不能不提到一件事，即“壬戌学制”的草拟和颁布。众所周知，近代学制的演变过程中，由《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学制》到《癸丑学制》，均受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影响，制定匆促，缺陷明显。1922年济南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颁行全国的《壬戌学制》，则鲜明浸染有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新教育理念。胡适与黄炎培分别作为北京教育会、江苏教育会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由胡适草拟的折衷1921年广州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草案、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学制会议决议案以及江苏省教育会修正案为底本的“审查底

胡 适

案”。胡适、黄炎培作为审查员为该议案最后的修正通过竭尽智慧，最终通过的“审查会报告案”，有着“知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是“颇有独到之处”等优点。胡适五四前后，极力鼓吹的教育要“谋个性之发展”、“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等新观念，黄炎培所着力倡导的职业教育均写入该提案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等相关内容之中。黄炎培代表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的“请各省区教育官厅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议案，得到了胡适大力支持。经大会讨论，修改为“请各省区教育实业官厅提倡职业教育，并确定计划，指拨专款，组织全省区总机关”，由政策上为职业教育在全国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新颁布的“壬戌学制”一改过去开篇首述教育宗旨的做法，代之以“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七条标准，显然，这是一个深受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提案”。

实验主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实用主义，不过胡适认为译成实验主义更为合适。胡适终生服膺杜威，公开声称自己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黄炎培与实用主义及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也非一般。黄早年曾著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等文，作过《实用教育》为内容的浸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演说。1915年黄炎培随北洋政府游美实业团出访美国时，即对当时名闻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黄曾记之曰：“若论实质方面，则吾侪比年所研究之实用主义，此行寄予我以无数崭新材料。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月进而未有自己，凡种种设施，昔仅得诸文字或托诸理想者，今乃使我耳目亲闻见之，而盖深信其必可行，且必有效。”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事，世人皆知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出力甚多，其实黄炎培也是出力筹划人之一，并为杜威来华讲学邀请团体和讲学薪酬事奔走落实。最后由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北京大学、北京尚志学会等共同出面邀请并承担费用。5月3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作来华首场演说，胡适作口译人。此前一天，胡适专门在江苏省教育会作“谈谈实验主义”演讲，用意为杜威“开辟出一条道儿”。胡适、杜威等演说都在黄炎培主持的《新教育》杂志及时登载消息或完整的演说词。北京“五四”事件后，形势骤变。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悄然辞职南下，杜威北上讲学事将成泡影。此时蔡隐居在沪，外务多由黄炎培、蒋梦麟等出面。黄炎培及时写信给留守北大的胡适，说明正在运动于南方筹建一新大学，拟积聚可能被北洋政府压制、解散的新派人士。而“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后来正是在黄炎培、蒋梦麟等积极筹划奔走下，由江苏省教育会出面，解决了杜威讲学期间俸金担保问题，杜威也得以于5月下旬顺利北上开展系列讲演。

黄炎培其后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深受杜威教育观直接影响。1919年7月，黄炎培专门抽出时间研究杜威的教育哲学并做了详细的读书札记。杜威的一些教育论点，如“教育之为事，不惟训练人之脑，尤当训练人之手。今科学之昌明，皆人类手与脑二者联络之成绩也。希腊时代，号称文明，而但闻文学之发达，不闻科学之发达，则缺乏手之训练故也。故手、脑二者联络训练，一方增进世界之文明，一方发展个人天赋之能，而生活之事寓其中焉。此普通教育，非特别教育也。苟予一般社会以是等教育，则最大多数之幸福即在乎是。”黄炎培认为，杜威此说可以澄清中国社会和国民对中华职教社所持职业教育主张的疑惑，“今后其可无庸疑骇，而若中小学校加设农、工、商等职业科，或疑为混乱学制者，如博士言，二者直当认为一物，而非可别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外矣。”1920年5月，杜威应江苏省教育会邀约，在南京高师等校演说“职业教育”、“世界进步标准”等，黄炎培每次都认真聆听，细加体会。1921年7月，当黄炎培给商务印书馆所办国语讲习班同学主讲“职业教育”专题时，他的职教思想已进一步开阔提升，把职业教育放到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中比照，结合杜威等名学者的论观，参照中国国情，极言职业教育为“自救救国之道”。

如前所述，胡适与黄炎培早期对中国新教育事业的开拓维新，对中国新文化事业的躬身奉献，是贯穿两人救国爱国的理性之光。

（责任编辑　庄建平）

旧中国的军衔制度

● 徐 平

军衔制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20 世纪初，晚清军队引入世界通用的军衔制度。以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几个时期实行的军衔制度，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军衔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和沿革。

晚清军衔制

清朝在灭亡前，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

当时，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清军战斗力的脆弱，在面对列强的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一些大臣、督抚纷纷上书，条陈时务，要求清廷迅速建立一支新式武装。清朝皇室也痛感中国兵制过于陈旧，已不合时宜。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必须改革兵制。于是采纳众议，决定效法西洋，训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旧式绿营军队。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编练新军。

清朝的新军，在编制、装备和操法上，完全仿效西方，而在人事制度上，基本上还是采用过去绿营制的一套老办法。在编练新军过程中，遇到许多矛盾，对推行新制障碍重重。因此，清政府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继续在所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移植西欧式军衔制，试图通过军衔制度来改变当时“重文轻武”的流弊，振奋士气，提高军队的社会地位，改变官职与官衔之间严重失调的状况；改革官兵制服与识别标志，既整肃军容，亦适应操战；实行国际上大体统一的衔级制度，以利于国际交往。

清政府从 1904 年开始，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的章程制度，逐步推行西欧式军衔制。1904 年 12 月，清政府练兵处会同兵部向朝廷奏准《另定新军官制事宜》，建议“参仿八旗官员之秩序，旁采各国军营之规章”，按照西方军官军衔的三等九级制，取代旧的官阶制度，建立新军的阶位品级体制，军官“区为三等，析为九级”。

1905 年 3 月，练兵处、兵部设计出军官军服和军衔标志的第一个图案式样。8 月，练兵处提出军官授衔的标准、条件、程序和要求。12 月经清政府批准，陆军军官开始按新官制评定等级，从而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军衔等级：

上等第一级，正都统；
上等第二级，副都统；
上等第三级，协都统；
中等第一级，正参领；
中等第二级，副参领；
中等第三级，协参领；
次等第一级，正军校；
次等第二级，副军校；
次等第三级，协军校；

1909 年 11 月，军咨处又奏请朝廷在军阶第一等第一级内正都统之上增设 “大将军”、“将军”两衔，与正都统同为上等第一级；设立军士衔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在军官和军士之间增设“额外军官”衔一级。

1910 年 12 月，陆军部对军衔授予及晋升年限、军官职务任免、最高服役年龄、军官考绩办法

等,都作了详尽规定。如规定各级官佐的最高服役年龄为:正都统,65岁;副都统,62岁;协都统,58岁;正参领,55岁;副参领,52岁;协参领,50岁;正军校,48岁;副军校45岁;协军校45岁。又规定,凡正都统荣获大将军、将军称号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制。这一章程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官服役条例。

不难看出,如按现在的军衔称谓,晚清的“都统”对应将官,“参领”对应校官,“军校”对应尉官;“正”、“副”、“协”分别对应上、中、少各级。从“正都统”至“协军校”这九级,分别对应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大将军”、“将军”和“正都统”同为一级,是荣誉军衔,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元帅。“额外军官”就是准尉。士兵军衔称谓与现在基本相同。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军衔制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沿用了刚刚实行不到一年的晚清军衔制,但做了一些变动,主要是废除清朝军衔制的军官衔称,取消所有品级,仍按原来的三等九级,规定了新的军衔名称,军士和兵均改为二级:

上等官佐:大将校、中将校、少将校;

中等官佐:大领、中领、少领;

初等官佐:大尉、中尉、少尉;

额外军官;

军士:一等目兵、二等目兵;

兵:一等兵、二等兵。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又对军衔等级和称谓做了修改,由六等十四级增至六等十六级:

上等官佐:大将军、左将军、右将军;

中等官佐:大都尉、左都尉、右都尉;

初等官佐:大军校、左军校、右军校;

额外军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右军校升左军校2年;左军校升大军校3年;大军校升右都尉4年;右都尉升左都尉、左都尉升大都尉、大都尉升右将军各3年;右将军升左将军4年;左将军升大将军无定年。

1912年8月,北洋政府公布新的《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军官仍为三等九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北洋政府还有两个特殊的规定,其中:

虚衔规定:将官衔在正式授予之前,可以先加一个虚衔,即陆军上校可加少将衔,陆军少将可加中将衔,陆军中将可加上将衔。如护国名将蔡锷,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追赠军衔的规定:军官作战阵亡或病逝后,依其生前业绩,可以追赠高一级的军衔,如中将可以追赠上将。

国民党军队军衔制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把还在小学读书、只有12岁的儿子马继援,委派为青海省南北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更为荒唐的是,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竟然给予正式命令,发给了委任状。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一些地方军阀,手中不过万把人最多几万人,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

将官: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

校军: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海军士兵分八级，称谓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佐衔,最初等级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但改变了称谓,即在军官衔的前面冠以专业名称，如 “军需少将”、“军医中校”、“军法上尉”等。1934年以后,军佐衔改用新称谓,将级军佐衔统称“监”,校级军佐衔统称“正”,尉级军佐衔统称“佐”。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现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在当时主要军事国家中是比较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比较复杂。除了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档次外,还有中将加上将衔和追赠上将几种。

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衔级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

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常服的军衔标志，抗战结束前都是金版领章上缀3颗三角星。抗战以后,常服的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因此，也分别被俗称为“三星上将”、“四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有人是死后才被追赠的,如张自忠、廖磊等;还有人生前死后都为正式晋升二级上将，如钱大钧、罗卓英等。

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对驻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地的武职官员,颁行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于清末的军官衔称:一等一级称都统、一等二级称副统、一等三级称协统,二等一级称都领、二等二级称副领、二等三级称协领,三等一级称都卫、三等二级称副卫、三等三级称协卫,此外还设有准卫一级。

中国的军衔制从清末建立到民国的几次改动,军衔等级中都没有“大元帅”这一级,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的大元帅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孙中山等人的大元帅并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力象征。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即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有130多名议员出席,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军政府设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均由国会选举产生。大元帅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元帅则协助其工作。9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大元帅职,但陆、唐二人不愿和孙中山合作,分别通电拒受元帅职务。可见,孙中山的大元帅是一种职务,即最高军政长官,其权力相当于实行“总统制”国家的总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而不是军衔。

其实,在晚清实行军衔制时,就有陆海军大元帅一职,是由光绪皇帝兼;光绪病逝后,宣统皇帝即位,因他当时才3岁,大元帅之职由其父摄政王载沣兼。

而民国时期的大元帅也不止孙中山一人。北洋政府历届元首(总统或执政),均兼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1月,孙中山督师北上,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胡汉民在广州先后代理大元帅职。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大元帅也是一种实际职务名称,其权力相当于实行“内阁制”国家的总统。

1934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长春当上了“满洲国”儿皇帝,并兼“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即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是旧中国最后一位大元帅。

以上这些大元帅都不是军衔。如蒋介石就任大元帅时,军衔仍为特级上将,直到1975年蒋在台湾去世时,其特级上将的军衔都未曾改变过。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

——“晚晴园”参观见闻

● 杨兆麟

2002 年 2 月初，我到新加坡去探亲，听说这里有个“晚晴园”，孙中山当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人们都知道，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大约 20 年之久，在日本、美国、南洋（即东南亚）、欧洲各国华侨聚居的几十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一些传记中大都记述得很简略，因而，我对“晚晴园”发生很大兴趣，三次前往参观采访。

从市中心向东 5 公里左右，有一条大约 100 米长的“大人街”，门牌 12 号的矮墙上，刻着三个涂金大字：“晚晴园”，在这座花园别墅里，开设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如茵的草坪，葱茏的树木，围着一座宽敞、明丽的二层楼。隔着铁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赤褐色的高大石碑，镌刻着涂金大字，中文竖写，英文横写，是引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草坪的中央，在一米多高的方形石头基座上，安坐着孙中山的铜像，神态沉静、刚毅，似乎正在思索和谋划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花园的左侧，横列着长长的黄铜浮雕，刻画了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当时名星加坡）景象，是孙中山当年所看到的：狭窄的街道，一些平房和店铺，几座二三层小楼，来往行人和车马，挑担的小贩，港湾、帆船等，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应该珍惜今天的舒适生活来之不易。我第一次去是星期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多数说广东或者福建“官话”，是华人的后裔，也有一些西方人，听不到笑语喧哗，表露出人们对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尊敬。

我进入室内，参观了设在一楼、二楼的“历史走廊”、“时代走廊”、“奋斗室”、“新加坡室”、“南洋室”、“集思厅”和“遗珍室”，观看了很多照片、绘画、图表、文物、塑像，听了几段录音，看了录像片和电影片，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政变、义和团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劫掠的照片和绘画。腐朽没落的清皇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复印件)，陈列在“历史走廊”的玻璃柜里，有的老人正在对子女低声讲述。大好的神州河山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国势危殆，人民多灾多难，想起那黑暗的年代，仍然令人感到愤慨和屈辱。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父亲、贫苦农民孙达成和母亲杨太夫人的照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陆皓东、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同政见人物的照片；孙中山在广州、澳门行医使用的听诊器、血压计、小刀、镊子、毛笔、砚台、图章的复制品等，都十分珍贵。这个纪念馆虽然名为“南洋”，实际上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曲折跌宕、波澜起伏的一生和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在一楼的“历史走廊”一张大幅照片引人注目，标题是《新世纪第一个劳动节——2001 年 5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人群如潮，红旗招展，这是自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来，人们都很熟悉的场面，它公认和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地位。

我从照片和录像上看到，这里本来是梅姓侨

商的住宅，后来被侨商张永福购买，请母亲在这里颐养天年，借用唐代李商隐的诗句，取名“晚晴园”。孙中山曾经三次在这里生活和办公，不少革命志士来这里聚会，或者作为往返欧洲、亚洲的中途站，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此后，历经几十年的人事沧桑，屡次易主，年久失修，房屋残破，庭院荒芜。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侨胞们踊跃捐款，修缮粉饰，培植花草，收集文物，布置陈列，使它焕然一新。

在新加坡的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的后裔，为了使年轻一代了解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精神和新加坡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政府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历史古迹”，予以重点保护。热心的侨胞们出钱、出力，筹办了在东南亚各国中规模最大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其内容的丰富和完备仅次于中国南京中山陵和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的纪念馆，在2001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5周年纪念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我特别关注和仔细参观了“新加坡室”和“南洋室”。由于新加坡地处往来亚洲、欧洲、非洲、澳洲的交通孔道，较早铺设了海底电缆，通信联络方便，金融、贸易活跃，因而被选做南洋一带革命活动的枢纽，孙中山八次到新加坡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斗足迹。参观以后，我还有一些疑问，和纪念馆馆长冯仲汉约妥，第二次前往“晚晴园”。可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二人竟是同行，经历也颇为相似，而且都已经年过古稀。他在新加坡的电台、电视台工作了32年，曾经随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国家采访。退休以后，继续为报纸、刊物撰稿，当一名“老记”，后来在中华总商会主管文化和社会事务，成为这个纪念馆馆长的合适人选。他说：“我们筹建这个纪念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很多工作都很艰难，例如一些人物缺少资料，我专门跑到不少陵园，从墓碑上调查他们的生平。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

孙中山最早到新加坡来是在1900年7月，那是一次带有冒险性的、非同寻常的行动。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共同扶危济困、强国富民，孙中山一度希望和在戊戌政变以后也逃亡日本的康有为联合行动，通过朋友去说服、规劝，都遭到他的拒绝。1900年春，康有为到了新加坡。热心支持中国革命，还救助过康有为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自告奋勇，取得孙中山的同意，远赴新加坡，再次游说。可是，康有为冥顽不化，坚持君主立宪的观点，虽然光绪皇帝已经被慈禧太后幽禁，他还是要报答“圣恩”，绝不当“贰臣”；他甚至怀疑宫崎是“刺客”，向当时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告发，把宫崎逮捕入狱。孙中山得到消息，不顾自己正在被清朝政府通缉、捉拿的危险，赶到新加坡，请侨胞设法营救。宫崎取保释放，被遣返日本，永远不准再来。孙中山也被驱逐，限令5年之内不许入境。孙中山识破了康有为的嘴脸，抛弃幻想，分道扬镳，从此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如同水火之不相容，这可以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收获。

晚晴园

孙中山第二次到新加坡来，只能在5年以后了。在青少年时期，孙中山和同乡尤列（注1）、陈少白等人志同道合，成为知心朋友，他们目睹清朝统治者昏庸腐败，丧权辱国，认为“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以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孙中山语，下同）。1895年，尤列参加了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准

备工作。1901 年,孙中山请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在香港的医学院与孙中山同学,赞成他的“医人不如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一叶堂”医馆,在“望闻问切”、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广交朋友,联络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建立了本地的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孙中山在檀香山(夏威夷)看到了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尤列担任“名誉编辑”,在发刊词中阐述了在南洋大展宏图的宗旨,这是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孙中山和尤列通信,知道新加坡有一些“热血同志”。1905 年 7 月,孙中山从法国乘轮船去日本,中途在新加坡靠岸。尤列介绍张、陈、林和孙中山见面,到进步侨商团体“小桃源俱乐部”会餐。张、陈、林原来都受保皇派的影响,和尤列交往以后,经常到“小桃源俱乐部”讨论国家大事,又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上海《苏报》刊登的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论文,逐渐改变观点。孙中山和老友新朋促膝长谈,探讨如何奋发图强,报效国家,坚定了他们的决心,拓展了新加坡的革命阵地。孙中山因肩负重任,这次在新加坡只停留了一天。

几年中,孙中山万里萍踪,羁旅东西,在欧美各国广泛考察,分析研究,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到了日本以后,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出版机关报《民报》。他在报纸上和会议上反复宣传三民主义学说,主张把民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避免欧美社会的“祸害”。

时隔不久,1906 年 2 月,孙中山第三次到新加坡。张永福考虑到,“晚晴园”离繁华的市区比较远,不大引人注意,相当安全,商得母亲的同意,请孙中山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孙中山这次逗留了两个星期,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吸收会员 12 人,推选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在宣誓会上,孙中山以他那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勉励大家胜不骄,败不馁,受到挫折不要灰心,可以重振旗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有两个人,也要坚持到底”,“为真理而奋斗,即使牺牲了也虽死犹荣”。在“新加坡室”,我看到孙、陈、张会后在楼前的合影,三个人都在中青年时期,神采焕发,气宇轩昂。由于新加坡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孙中山在这年 7 月第四次到新加坡,进一步健全同盟会组织,还前往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英国殖民地,统称马来亚),先后去了吉隆坡、槟榔屿、芙蓉,怡保、太平,还请朋友去马六甲、沙捞越等地活动,组建同盟会,而把南洋同盟会的领导机构设在新加坡。

1907 年 3 月和 1908 年 3 月,孙中山第五次和第六次到新加坡。在 13 世纪,新加坡名为“狮城”,现在还用为别名。中国革命者的广泛活动,有如雄狮怒吼,声震长空,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缅甸、暹罗(即泰国)、安南(即越南)等地爱国侨胞闻风而动,纷起响应,同盟会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1908 年那次,孙中山往返于新加坡和槟榔屿,还去了泰国,一共度过 14 个月的时光。他认为,革命应该“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在新加坡帮助办好《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并且用“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三次在《中兴日报》上发表文章,联系国家贫弱、民生凋敝的情况,提倡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对君主立宪的观点大张挞伐,获得侨胞的普遍理解和拥戴,《中兴日报》每天的发行量达到 4 万多份。一家历来持保守观点的报纸发表评论,认为“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孙中山还帮助办好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和保皇派的报纸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论战,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同盟会在各地开办书报社,陈列进步书报,免费供侨胞们阅读。我在“南洋室”长时间驻足,欣赏一幅整整占了一面墙的巨大油画,孙中山站在一间茅屋前,慷慨陈词,振臂高呼。黄兴坐在旁边,他和孙中山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也几次到过新加坡。椰树下,山坡上,侨胞们有些站立,有些席地而坐,大部分是橡胶工人和锡矿工人,赤膊着上身,凝神聆听。作品色彩绚丽,形象生动,有不少人在我身边静静地观看。有鉴于很多侨胞的文化水平不高,孙中山从广州、香港邀请粤剧团来,演出中国古代勇士反抗暴虐专政的历史剧,一些同盟会员利用这种场合发表演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当地侨胞也成立剧团,把革命烈士徐锡麟、秋瑾的悲壮事迹编成戏剧演出,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进入“新加坡室”,

烈士树

迎面就是一幅彩色油画，描绘了“梨春园大舞台”正在演出《荆轲刺秦王》的情景。保皇派一度财力比较雄厚，又掌握了舆论阵地，不少侨胞受到迷惑。经过同盟会员的不懈努力，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君主立宪的谬论口诛笔伐，以扫灭“保皇毒焰”，很多侨胞都觉醒了，只一年多的时间，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人。

孙中山第七次到新加坡是1910年7月，逗留一个星期以后，前往槟榔屿活动。

1911年10月10日，国内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新加坡等南洋各国的侨胞，为这次起义提供了大部分经费，不少人都是倾囊捐献。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知道消息以后，他非常兴奋，认为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得到各国的支持和承认，于是前往欧洲开展外交活动。12月15日，他在回国途中第八次到新加坡，当时本地的同盟会员已经发展到15000人，形成强大的势力。由于国内电报催促，他只停留了一天，就登轮驶往上海，以后再没有机会故地重游。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中国的南方领导和发动过九次武装起义，其中有三次是在新加坡、河内和香港研究、准备的，即：广东、福建两省接壤的潮州黄岗，广州以东不远的惠州七女湖和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即睦南关）。尤列参加了惠州起义的组织工作。林义顺参加了潮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沿途散发《革命军》1000多册。新加坡侨胞许雪湫（即许雪秋）是潮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之后，再次前往潮州，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正当36岁的壮年就以身殉国了。新加坡侨胞邓子瑜是惠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不少侨胞参加了潮州和惠州的起义，并且从香港秘密运输了大量枪支、弹药。

在“新加坡室”，用高分子聚合体塑造的和真人、实物同等大小的人物、桌椅、茶具、书报等，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对面正中坐着主持会议的孙中山，周围坐着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胡汉民、汪精卫；自幼练拳习武、研究兵法的黄兴站立发言，提出武装起义的方案；参加过第一次广州起义，表现机智、果敢的女革命志士陈粹芬在身后为大家斟茶倒水；她的哥哥陈和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正站在窗边，警惕地注视着楼外的动静，保护会议的安全。它生动地再现了某一个晚上的秘密会议的情景，好似静悄悄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对面的墙上，我看到十位新加坡侨胞的遗像，肃然起敬，他们都是在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满腔沸腾的热血，染红了大街小巷。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在槟榔屿和香港部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南洋各国有30多位侨胞告别亲人，飘洋过海，秘密潜入广州，奋不顾身，拼死肉搏，把忠骨埋葬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其中南洋侨胞占遗骸总数的1/3以上(注2)。然而，烈士们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孙中山说：“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那九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忠勇的爱国志士们，包括海外的大批骨肉同胞，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代皇朝，为最终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开辟了道路。

在二楼的“时代走廊”，展出了本地艺术家陈瑞献书写的一副对联：“晚色多回韵，晴云越秀明”，上下联用“晚晴”二字“藏头”，上联高度评价孙中山大业晚成，有如音韵飘荡，令人回

味绵长；下联把他复兴祖国的理想描绘为晴空白云，万众昂首仰望，越看越秀雅、明朗。两行草书运笔潇洒，寓意深长。

冯仲汉陪我来到花园，指给我看几株小苗、小树，都是孙中山在南洋时期爱吃的热带水果。那棵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特地用铁丝网围护的小酸子树，是他到翠亨村去，从孙中山早年种植的老酸子树上采集的种子培育的，盎然的生机，显示着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和爱戴之情。他带我来到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树下，说道："在孙中山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很多侨胞舍生忘死，为国捐驱，这棵大树正是活的见证，因而名为'烈士树'。在纪念馆准备开放的时候，我们致函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请他写了'烈士树'三个字；同时致函台湾海基金会长辜振甫，请他写了'仁心果'三个字，那也是孙中山爱吃的一种热带水果。我们把一块大石头切割为二，分别刻了他们二人写的三个字，涂上红漆，安放在草坪的两角。孙中山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块石碑，殷切期望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他的宏伟理想。"冯仲汉微笑着娓娓而谈，表达了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我衷心赞叹，眼前这个"品"字形的安放很巧妙，构思很深刻。

2002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77周年纪念日，我收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请柬，应邀参加纪念馆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隆重集会，恰巧又躬逢其盛。77年前，当一颗巨星从天空殒落的时候，举国一片哀悼，侨胞无不痛惜，唁电、唁函、挽联、挽歌像雪片一般飞到北京，纪念馆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内知名人士、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40多幅挽联，请本地书法家精心临摹，悬挂在二楼大厅，供人们观赏、缅怀。广东省中山市海外联谊会铸造了一尊孙中山的立姿铜像，表现了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风采，在这一天赠给纪念馆，安放在楼房门厅的中央，使纪念馆显得更加庄重。这栋红顶白墙、素洁典雅的楼房，背衬蔚蓝的天空，浮游的白云，有如一座历史丰碑，巍然屹立。

（注1）孙中山的挚友尤列，在新加坡的纪念馆中写为"尢列"，比"尤"少了右上角的一个"点"，英文注明"Wang"，录音中读如"汪"。我向冯仲汉请教，他告诉我，"尤列"和"尢列"是同一个人，在他家乡的发音中，"尤"和"汪"相近，因而有些侨胞称他为"尢列"，如果写出来，就不能加上"尤"字的那个"点"。

（注2）关于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南洋侨胞，由于当时统计的困难，各种书刊记载的人数从27人到32人不等。起义之后，最初收殓烈士遗骸72具，以后又三次收集、统计，共有86具，在黄花岗72位烈士的陵墓旁，设立了一个刻有14位烈士姓名的石碑。

（责任编辑　吴　思）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2001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

● 王楚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中美英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应美英敦请,中国政府派出由戴安澜将军率领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二〇〇师,最先进入缅甸,义援英军。二〇〇师先后在坚守同古、攻克棠吉的著名战斗中,击毙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横田大佐和第五十六师团入部兼廉少佐以下官兵4500余人,毁其坦克5辆、装甲车9辆,俘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厥功实伟。使日军受到自南侵以来首次沉重打击,横田大佐生前在日记中惊呼:“我军南进以来所向披靡,进攻同古却遇劲敌。劲敌者中国军二〇〇师是也。盖因轻敌和指挥错乱而受挫。”日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也对第二〇〇师的英勇善战极为称赞。缅甸战役原可取胜,奈英军作战不力,擅自后退。使二〇〇师孤悬敌后,陷入重围。戴师长以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指挥,带着二〇〇师,历尽艰险,突破重围,于5月18日行抵西保至抹谷公路西南侧,突遭日军伏击,身受重伤,因缺医少药,不幸于26日17时40分在缅甸瑞丽江畔的茅邦村殉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亲书:“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的挽联,遥致沉痛的悼念!周恩来副主席则书“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悼词以志哀思!国民政府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入祀忠烈祠,其光荣事迹宣付国史馆。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其追赠懋绩勋章。

我有幸同戴安澜将军在缅甸战场接触较多,谨追记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表缅怀崇敬之挚情!

我开车接戴师长到缅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被派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的机要参谋,12月15日入缅。侯腾与缅甸英军总司令胡敦商定,派我率官兵5人,电台1部,到毛淡棉任英十七师联络参谋,并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英军作战。志愿队仅训练两周,就相继于1942年1月13、15、20日,在帕罗土、密沙、高加力伏击日军,打死星光少佐以下日军146人。2月23日在锡当河掩护英军突围成功,荣获英国政府勋赏。

3月1日,蒋介石夫妇第二次来到腊戍。林蔚急电召我前去汇报英军在缅南作战情况和目前的状态以及日军现况。当日中午,他叫我亲自开车前往芒市接戴师长来腊戍一起晋见蒋介石。同时还要我带领英军汽车队去接运二〇〇师的部队来缅。

下午4时,英军汽车队长汉斯上尉来向我报到,他说已有268辆大卡车(均有车棚)停在山下公路边,等候我的指示。我马上揣着侯腾写给戴师长的信,开车随汉斯上路,他那长长的汽车队便跟在我们车后,向滇西进发。腊戍到畹町186公里,我们开了两小时15分便到。见有部队在此,一打听才知戴安澜师长刚从昆明赶回,现住在遮放镇东头一座大宅院内。我很快就找到了戴师长住的宅院,进门一看,见他正伏案写字。经副官孔德宏报告,腊戍参谋团来人找他,他便放下手中的毛笔,举目向我打量后招呼我入坐。我作自我介绍后,即取出侯腾的信给他。他阅后问

我:你这次带来多少辆汽车?每辆车能乘载多少人,能装几匹马?何时出发?我请来汉斯上尉同戴师长面谈。他们见面后就用英语交谈。随后由周之再参谋长同汉斯上尉一道去分配车辆,安排部队登车。当晚9时过后,戴师长带着我和他的副官、卫士,到各处巡视,见一切正常,官兵和装备均已上车,便对周参谋长说:"我想坐王参谋开的车,好同他聊聊,你就坐我的车吧!"他说完就坐到驾驶室我身旁的空位上。他首先垂询我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的过程与收获,平时爱看什么书,是否坚持天天自学,有什么爱好和专长?接着他问我:"你既然8岁就离家外出谋生,并一直坚持半工半读,刻苦勤奋,14岁就读到高二,为何没有考大学而选择当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我说:"日寇入侵后,抗日救国就成了我唯一志愿。"戴师长得知我在1937年8月23日攻克罗店的战斗中当上排长,后来参加过"围彭泽、攻湖口、援瑞昌"各役,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勋,被罗卓英称为"能打仗的娃娃排长"的经历后,他竟然高兴地喊了我一声"楚英老弟呀!"(他比我年长19岁,已是我的师辈)紧接着说:"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应先到野战部队从排长做起,同兵一块生活,亲历训练和实战的磨练,增长带兵、练兵、用兵、打仗的本领;同时自学文化,再进'陆大'深造,学习军事理论,这是军官成长的必由之路。"

戴师长同我相识虽只几小时,他的一片赤忱,使我既振奋又感动。车到贵街,他叫我停下来等后面的车队。他下车活动了一会儿就回到车上,边吸烟饮茶,边听我讲述英军在缅南作战经过和日军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时时发问。车到侯腾的办公楼院内,侯腾闻声下楼来迎。我见戴师长随他入室,便开车回到公路上等候接运二〇〇师的车队,领着他们开进英军南窑营房住宿,并代为联系补给运输事宜。

蒋介石五召戴安澜面授机宜

来到腊戍,已是3月2日凌晨4时,蒋介石已入睡,未去惊动他。这天上午蒋要接见英国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便由侍从室主任林蔚先同戴师长面谈有关二〇〇师入缅后的任务和行动。随后,戴师长就赶回南窑师部,巡视部队;并垂询派驻英军后勤处的联络参谋关于已到腊戍的部队用火车向前方运输以及由英军继续派汽车赴龙陵、芒市接运二〇〇师后续部队的安排情况;还调查了解各部队的缺员情况和急待补充的装备细目,同时准备蒋介石召见时的汇报材料。

由于英军联络部长马丁少将通知侯腾说,韦维尔要召见我这个缅甸华侨志愿队长,林蔚就安排我负责开车接送韦维尔。在腊戍机场,当马丁向韦维尔介绍我是缅甸华侨志愿队长时,这位一向对中国有偏见、顽固坚持殖民主义传统的独眼将军,竟然热情地来同我这个小上尉握手,并笑容满面朗声说道:"中国军人是好样的,我和英军将士衷心地感谢你们!谢谢!谢谢!"韦维尔这几句话确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后来他于4月18日给亚历山大的密电中却说:"将缅甸的英军完整地撤到印度,让中国人在缅甸去同日军周旋。"这说明韦维尔当初仅是一种外交辞令。不久,他派温格特来缅甸,把华侨志愿队从我手上要了过去。

这天下午,我送走了韦维尔,就开车到南窑军营,接戴师长到蒋介石的住处波特酒家,由林蔚陪同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向戴师长详细问询了第二〇〇师的现况后,接着说道:"中国远征军必须独立自主地规划缅甸作战,请参谋团尽快拿出计划或方案。"蒋介石要侯腾通知英军应适时给予帮助,使其免遭锡当河那样的挫折,免生唇亡齿寒之痛。他又说:"3月10日是日本的陆军节,日军将可能来攻,企图占领仰光,以耀其威。从起点来切断我国际通道——滇缅路,达其西击印度、东掠昆明之目的。"蒋介石紧接着向林蔚、戴安澜宣示他的缅甸战略腹案。他还亲切地问戴师长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戴师长一一作答。蒋介石凝神倾听戴安澜的汇报,时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不断地发出"好好"的声音,最后面嘱林蔚尽快妥善解决二〇〇师的需求。

这天傍晚,蒋介石召见刚到腊戍的杜聿明和戴安澜,并与宋美龄一道同他二人共进晚餐。饭后,杜、戴二人来到林蔚处,继续商议固守同古和选择第五军主力集中地域的问题。杜聿明听说我在缅南协助英军作战两个多月,对英军和日军情

况有所了解，他就请林蔚召我前去同他面谈。我一进屋，戴安澜即予介绍，杜聿明便很客气地邀我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请我谈谈英军和日军的情况。我便扼要地复述了在《英军缅南作战之我见及对日军状况之研判》汇报材料中的内容。杜聿明饶有兴趣地听着我讲，还掏出本子记录，并时常插问，一直谈到深夜才让我离开。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杜聿明将军，他那儒雅的风度同戴安澜将军一样。

3月3日7点半，林蔚对我说："委座8点钟召见你，垂询英军和日军的情况。"杜聿明和戴安澜恰好叩门而入。他二人来此等候蒋介石再次召见。林蔚便说："今晨早餐时委座说，他8点先同王楚英谈，然后同你二人谈。"杜聿明一听顿显惊诧神色，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他马上笑盈盈地用手拍着我肩头说："楚英老弟：昨晚你向我讲的那些情况很重要，我正要向校长汇报。现在校长决定亲自同你谈，足见校长对此事非常重视。"戴安澜则提醒我要把日军惯用钻隙、迂回、包围的战法讲出来。我见到蒋介石时，他正端坐在桌后椅上，用炯炯目光对我审视了好一会儿，才亲切地叫我坐到他身边的籐椅上。我向他陈述，他听得很专注，不但时常发问，而且不时用笔记录，原定谈30分钟，结果却谈了110分钟，侍卫官多次按铃提示，他都不理，仍要我讲下去，直到俞济时蹑手蹑脚走近他身旁，轻声说杜聿明、戴安澜已等候多时，并说史迪威的飞机也快到了，他才让我离去；并叫侍卫官皮宗阚送给我一个牛皮的图囊和一张蒋介石半身戎装照片（上书"楚英同志"，落款"蒋中正"）、一套《总裁言论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接着派我开车到机场接送史迪威，便导致后来史迪威指名调我当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在史迪威到来前，蒋介石再次召见了杜聿明、戴安澜。下午送走史迪威后，又召集林蔚、周至柔、肖毅肃、俞飞鹏、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侯腾等人，指示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取的对策。

戴安澜任务极艰巨，战法更独特

3月4日，戴安澜欣然率师赴战，途中特赋七绝二首以明志。

其一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其二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8日，他率干部到同古及其附近详细侦察地形，作出兵力部署的决定。

13日，亚历山大（3月5日起接替胡敦任缅甸总司令，胡改任参谋长）来访，要求二OO师以皮尤河为主阵地部署作战，戴师长婉言拒之。

15日，史迪威带着我和费里斯、梅里尔等到同古察看二OO师的战备，并叫我给戴师长带来十多份缅甸新地图。戴师长对此很感谢，遂领着史迪威先到同古主阵地带进行视察。史迪威在施工现场对二OO师官兵激情地说："孩子们：你们是我的好部队。戴将军是我的好师长。我要带你们去收复仰光。将来还要打到东京去。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又说"我还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它不亚于任何盟军，而且会胜过他们。到了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 官兵们听了史迪威这种发自肺腑的、掷地有声的豪迈深情的话语都非常激动，人群中顿时不约而同地齐喊："打倒日本侵略者！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人声鼎沸，响彻云霄。戴师长也很激动，他当场剀切地表示：二OO师官兵决不辜负史将军的期望，誓死完成任务。史迪威问戴师长："大战在即，你有何要求？"戴答："请速补充3个基数弹药和半月给养。"史慨然允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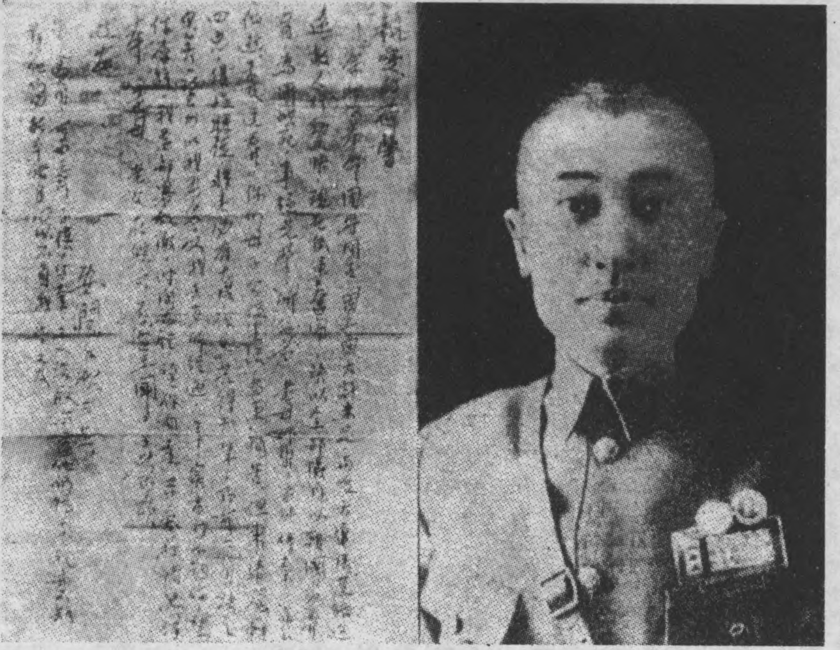
戴师长送走史迪威，立即驱车到皮尤河指导骑兵团严阵以待。

18日上午，摩托车连在卡纽昆同敌交火，击毙30余人。19日中午，敌增至700余人，在炮兵、装甲车掩护下向大桥扑来，其中百余敌军已冲到北岸，另大股敌军伴随装甲车正在桥上，副团长黄行宪断然下令开火，同时炸桥，几声巨响，两座大桥同时坍塌，桥上的日军和装甲车都葬身河中，幸存日军仍拼死反击。激战中黄行宪副团长不幸牺牲。深夜敌从上游向我后方迂回，戴师长即令骑兵团转移到良赤道克，继续阻敌。

20日拂晓，日军约600多人猛扑良赤道克。

骑兵连和五九八团1连依戴安澜的指示，埋伏在路侧，放过敌尖兵，俟其主力纵队进入伏击区即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丢下200多具死尸逃走。激战中副团长曹成中校阵亡，戴师长立令该团退守巧背。敌跟踪而至，幸黄景升副团长率五九八团周朗营及时来援，在巧背与敌日夜激战，毙敌坂本大尉以下300多人，击毁敌装甲车2辆，我方第2连王志夫连长以下51人伤亡。

23、24两日，日军三股，各约千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下，对坦德宾、屋墩、耶索轮番地进行猛攻，与我激战两昼夜，敌机还对同古城和开道机场投弹轰炸。在屋墩东西之线的前进阵地上，黄景升运用戴师长所教授的埋伏、夜间奇袭、近距离火力急袭与突击以及采取迂回击敌侧背等战法，先后打死日军第五十五骑兵联队副队长横田大佐和第一一二联队2大队长冈田少佐以下官兵500余人，击毁其坦克3辆、装甲车7辆，缴获机枪9挺，92式步炮1门，步枪166支，掷弹筒7具和横田大佐的日记（其内容见前面所述）等文件地图，日军自认“受挫”。黄景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戴安澜和遗书手迹

早在22日屋墩激战时，戴师长已感后援不济，决心以死报国，即书就遗书以示志；同时要各级指挥者指定身后的接班人，以防指挥中断，其死守同古、壮怀激烈之举措，确实感人。

敌军从25日起至29日，以一一二联队对同古南面、一四三联队对同古西北，骑兵联队在河东，对二OO师包围猛攻，并出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更施放毒气，均被我英勇官兵挫败，遂演成拉锯战，敌我均有重大伤亡，敌军尤甚。杜聿明见状，即令二OO师于29日午夜撤出同古。二OO师虽被迫放弃同古，其战绩却很辉煌，以一个装备差、缺火炮，仅9000人的步兵师，抗击着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约2万余人的日军机械化兵团，不但苦战了12天，而且歼敌4000多人，毁其坦克、装甲车14辆，俘获大批武器装备，使日军遭受到“南进以来的首次重创”，成为防御作战中一个成功的战例。戴安澜将军的功绩，将永耀史册。

戴安澜智勇绝伦孤军纵横敌后

由于英军背弃承诺，擅自放弃马圭、仁安羌等西线要地，迫使史迪威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接着东线第六军连战皆北，乐可、和榜、棠吉、雷列姆相继陷敌，腊戍危殆，全局震动。史迪威接受林蔚、杜聿明意见，派二OO师于4月25日一举攻克敌后重镇棠吉，对正向腊戍奔袭的日军机械化兵团第五十六师团的后方交通构成了严重威胁。4月29日，戴安澜带着二OO师6200多名官兵在洛伊文，正准备攻取雷列姆时，忽接杜聿明密电，告知腊戍陷敌，要他向北突围，到卡萨归队。而向北突围，不但要冲破日军的重围，而且要渡过南渡河、瑞丽河、伊洛瓦底江和腊戍至曼德勒公路、铁道以及西保至抹谷公路，既极艰难，又很危险。

5月18日晚二OO师在准备通过西保至抹谷的公路时，遭敌伏击，戴师长身负重伤，终因缺医少药，不幸于26日17时40分殉国。此后这个师的领导终于把二OO师6200名官兵和战斗装备，带出了日军重重围堵之困境，走上归国之路。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 余焕椿

一

去年5月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王若水。这是他患肺癌后第二次住院，据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老天真不长眼，为何这么多灾难和不幸都降于他一人！

病室很小，但是单间，很清静，条件也还好，有张小书桌和卫生间。虽然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但我总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内心不免有几分寂寞和悲愤。我不能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安慰，但我知道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需要人间真情和关爱。进门时，他正在便携式电脑上写文章，翻开的书刊几乎占去了整个桌面。他欣喜地起身坐到病榻边上，将椅子让给我。我说："你气色精神都不错。"他捋起右裤腿说："不怎么好，血液循环不畅，腿肿愈来愈往上了。"这确实是不祥之兆，我劝他平躺着，多休息，以减轻腿的压力。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注意力集中就不去想病痛和烦恼了。"

握别时，他给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说"有空看看"。题目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内容仍然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遗憾的是，我是理论的门外汉，不能同他讨论他所关心的问题，但他知道我是支持他的观点的，而且喜欢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很有特色，说理平易生动，有文采，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从他手中接过的最后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压在若水心上的一块石头，至死他都在做着掀翻这块石头的工作。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若水出了一本新书《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书稿付梓前，他给了我一份这本书的最初清样。过了一些日子，我准备将看完的清样奉还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书已经出了，手头只有几本，无法送你，清样你留着吧，真的很抱歉。"他接连讲了几声"抱歉"。我忙说："我喜欢清样，它比书更有纪念价值。"他还告诉我书名改了，原先的书名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现在倒过来了，成了副题，另加了个主题《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是出版商的要求。话中有些无奈，因为他希望有人为他出这本书。

后来他又给了我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正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孙月才文章的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文批评胡乔木把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样一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还有谁敢于争鸣。学术问题同政治挂钩，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危害。文章最后问："我们不是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可为什么在这个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非要定于一尊，我们不是常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吗，可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学术问题一再列为禁区"？孙月才是在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伸张正义，若水赞成孙月才文章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三个月后，若水要陪他的夫人冯媛去哈佛大学当尼曼研究员。《人民日报》几位老领导、老同事为他们夫妇饯行，专门安排了一个家庭午餐会。那天，若水身穿圆领短袖衫、短裤，不像是个

久病住院的人，他给大家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朝气、信心和乐观。闻讯赶来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多是年轻人，大家来送行，向他们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归来。谁知这竟成了同若水的永诀。2002 年 1 月 9 日，若水在波士顿与世长辞，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若水文章名），带着未遂之志而去的，怎能不令人心痛！

二

王若水，湖南人，有文章说江西人，都对。他祖籍江西，出生在上海，在湖南读书长大。他本人认定湖南，在各种表明身份的个人资料中写的是湖南。1946 年，若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北大校长是胡适，进步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亲国民党、亲美。若水说，胡适也有另一面，比较保护学生。军警抓人，胡适出面，说学府这地方是不允许军警人内抓人的。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若水同一批进步学生化装进入解放区，很快北平解放，旋又返回北平，在市委邓拓领导的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 年 1 月，邓拓调到《人民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年底，邓拓将王若水调来报社当理论编辑，并在同事面前称赞他“年轻有为”。从此，若水再也没有离开《人民日报》。

我是学新闻的，并不关心理论。1964 年大学毕业，有人透露，我将分到《人民日报》工作。为了熟悉这张报纸，利用北上报到前的一点空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浏览 50 年代的《人民日报》，对王若水参加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和后来与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开展长期论争有一些印象，知道《人民日报》有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所以进报社后时常注意他。

恰巧，我工作的教科文部与王若水同在二楼，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当时我还没有勇气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只是从旁观察。他比较秀气，沉静，稳重，甚至有点儿慢条斯理。不过，他给我勤于思考的印象十分强烈，吃饭，走路，开会，都是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问题。同事们都叫他“若水”，他长我 9 岁，又是名人，我不敢贸然“随大溜”，第一次面对面称呼他时，还是恭恭敬敬喊一声“若水同志”。他点头微笑，说：“他们都叫我若水，你是新来的，也不必拘束。”从此，我也称呼他若水了。

若水在《人民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虽是理论部的编辑，但他可以列席编委会，又是许多重要文章和评论的参与者和执笔人。1957 年 4 月 10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他写的。毛泽东在当天召见《人民日报》全体领导成员时，特地点名让王若水参加，并当着在座者的面握住王若水的手说：“你写了好文章”。

接着就批评邓拓，说他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实际上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一批社论题目，被一位领导扣压了。毛泽东不了解情况，就批评邓拓不宣传，而且很生气，说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甚至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那是王若水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用了四个字概括：“如坐针毡”。若水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那样对待邓拓，甚至于想到：“毛表扬我，是为了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这样才好批评邓拓”，甚至感到“汉元帝”、“优柔寡断”之类的话是另有所指。所以若水说：“毛泽东虽然表扬了我，但我心中并不好受。”

1957 年反右派，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跌进了万丈深渊，王若水能逃过劫难，与毛泽东的这次接见和对他写的社论的表扬不无关系。但他并不张扬这次的表扬，也未因此而得福，他仍被划入思想有问题知识分子之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这次下农村，对王若水来说有两大收获。第一，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与报纸宣传大不一样的农村。1958 年正是大跃进第一年，若水说，农民吃饭都吃不饱，甚至饿死了人，报上还在吹嘘形势如何如何大好，觉得这是新闻工作的耻辱。他们赶紧写情况，通过报社内参向中央反映实情。这对他后来对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觉得彭德怀很冤，并深表同情。第二，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若水说，下

放期间，他反复读了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以前他了解的那个马克思要深刻得多。若水后来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深受“哲学手稿”的影响。1963年他的《桌子的哲学》也是受其影响而写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桌子的哲学》引发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热烈讨论，许多工农兵都参加了进来。若水吸收了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对《桌子的哲学》进行了修改，又写了一篇《再谈“桌子的哲学”》，但报社内部有人压制，还抬出关锋意见作依据，未能发表。关锋何许人也，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水虽两度受毛泽东表扬，却连发表一篇补正文章的权利都没有，而补正的正是毛泽东赞赏的《桌子的哲学》！可见若水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境遇并不佳。1980年1月，若水出版了《在哲学战线上》，《再谈“桌子的哲学”》方见天日，难怪作者在该书《序》中说：“时隔15年之久，这篇文章才找到了一个发表的机会，在我也是很有感慨的。”

这种处境预示着这位哲人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

三

我同若水真正接近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夕报社对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一个评论组，将理论、文艺、政治、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评论能手都集中在一起，强化评论工作，以改变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所处的被动局面。王若水是这个组的一员重将。

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评论组还没有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被戴上“保皇派”、“顽固保守势力”的帽子，靠边站了。王若水即被他们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1971“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情况有了变化。这时，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人民日报》，若水进了6人临时“看大样小组”，报社大多数同志十分高兴，但当时报社的领导鲁瑛不高兴，张春桥、姚文元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再落到周恩来手里。

当时，《人民日报》正被宣传方针所困扰。批林批什么，周总理主张批左，认为“左的东西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张春桥、姚文元唱反调，强调批左“不要过头”，林彪大肆宣扬过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这些左的东西不能批。若水是支持周总理，主张批左的，并在工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三篇批无政府主义文章，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上海方面受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立即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并利用《文汇情况》假借工人名义，批评这些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其实这期理论版实际上批的是张、姚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这块版就是王若水倡导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批林到底批左还是批右，是宣传上的大事，这期理论版的问题出来后，若水更感到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于是决定上书毛主席。若水深知总理与张、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有毛能作出裁定，而这样做又要冒很大风险，但他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多日苦苦思索，他终于将信发出去了。

信发出两天，若水告诉我们一个不利消息。若水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不同意批极左。王若水断定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我们大家也为他捏一把汗。

毛泽东虽然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

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之后,一定会吸取教训,对林的极左阴谋有所认识,赞成批"左",所以竭力鼓动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搞明确,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办,这就给周恩来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转向批右。这使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势力,帮助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处理若水的信。周总理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

周恩来一面把责任揽过来,说"是中央务虚不够",一面又想抢先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张、江、姚节外生枝。总理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竖着的。"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张、江、姚不买账,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虽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机排除异己,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于是提出"《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要把邪气压下去"。

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当时北京军区正在开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批林指导方针问题。姚文元知道王若水对批林的看法,特地点名让他去会上旁听,以便接受"新精神"。若水听出来了,政委纪登奎在北京强调批右,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批左。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反映了中国上层又陷入了一场严重斗争,而且斗争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批右的一边。若水心情非常沉重。

"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批到一年的时候,"四人帮"突然将王若水的问题升级到敌我矛盾,这是他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就这样,王若水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从此,我们见面机会愈来愈少。后来他妻子闹离婚,日子更不好过,连粮票都没有。有一天,我在报社见到他,头也白了,背也驼了,但他没有被压垮。若水对上书毛泽东一事毫不后悔,他觉得在《人民日报》那个岗位上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若水还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宁肯做个痛苦的清醒者,也不愿做个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若水是坚强的,因为他相信"四人帮"是真正的坏蛋,是真正的敌人,他要等到看到他们灭

亡的一天；因为他得到了社内外广泛支持，下乡无粮票，有人给他送；生病了，有人送药；在乡下，有人给他传消息，谈情况，分析形势；问候、安慰、鼓励，通过眼神、握手、电话不断传递给他，“四人帮”的耳目跟踪盯梢，也阻止不了这一切。更使他充满信心的是，红星公社的干部和农民并不把他当敌人，而是把他当客人，当与他们命运相连的朋友。

若水挺过来了，他是胜利者。

四

1976 年 10 月，“文革” 结束，若水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理论、文艺、社论。那几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斗争，纠正“文革”错误，引导舆论，起了重大作用。那时，他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不辱使命。为人民民主，为党风纯洁进行过勇敢斗争，因此惹恼了几个大人物，日子又开始不好过了。

经历过“文革”10 年磨难，若水有了很大变化，他有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践的唯人主义。若水说：“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若水表示，他将要全身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理解他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因为若水多次谈论“文革”中关于人的种种情况：一种是，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被当作人；一种是，迫害他们的人，失去了人性；还有一种，就是将人神化。他说，提倡人道主义，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做法的抗议。若水又说，“文革”时期这种种情况如何解释，那就是异化。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中国有愈来愈多的人关心和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0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若水去讲哲学问题，有学生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听不懂，请他解释。若水用一种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造成环境污染等等。这次讲话反映极好，1980 年第 8 期《新闻战线》遂将他讲话录音整理发表，影响更大。听说耀邦同志和他的家人听过讲话录音，耀邦说 “很感兴趣”。

但也有人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认为若水那样讲异化，是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并扣上“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帽子。若水曾申辩过，说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承认和批判异化是为了防止和克服异化，是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人民日报社老领导为王若水（前排左二）和夫人冯媛（前排左四）饯行。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

1983 年 3

月 14 日，是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为了纪念，中央决定召开学术研讨会，并确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周扬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物色了三个人作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王若水是其中之一，分工负责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报告十分精彩，听众向他报以热烈掌声。报告会第二天（3 月 8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报告会消息，消息中特别注明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全文，不料竟惹来一场大祸。当天早上，秦川和王若水分别接到当时中宣部的严厉批评。秦川和王若水被迫作了检讨，但使他们两位感到困惑的是：中宣部已经通知各报，周扬文章不得发表，唯独没有告诉《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从发报告会消息到发报告全文，中间有整整一周时间，中宣部完全来得及阻止报告发表，但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为什么。检讨没有起作用，中宣部还是宣布，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调离《人民日报》，但仍参加报社整党。

周扬听到王若水被免职的消息后，万分感慨，曾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其夫人苏灵扬说，“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已呢”？此时的周扬，日子也不好过，他受到很大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周扬同意了，他采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方式，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1 月 6 日，各报都登了周扬的这个谈话，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若水说周扬是被迫的，这样周扬就失去了反批评的权利，他也感到十分惋惜。夏衍一针见血，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文章是你写的。”

九个月后（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在上次周扬作报告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若水听了这次报告，并接受胡乔木多次表示“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的要求，表示了答辩之意，但若水没有动笔。直到邓小平看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后，称赞文章的同时也说，“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若水才下决心写答辩文章。这个时候，中宣部发出学习乔木文章的通知中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要力求在我们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且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这就更加鼓起了若水的勇气。

不久，《哲学研究》前来向若水约稿，稿成后，《哲学研究》告知，文章审阅通过，定于四月号上发表。此时，若水文章还在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香港《镜报》突然将征求意见稿登了出来，使若水陷入被动，问题搞得更复杂。

若水在编委会上多次自我批评，两次讲人道主义和异化，一次专讲《镜报》事件，讲得都入情入理。若水写了许多文章，既无反动政治内容，又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都是学术讨论，为什么就容不得不同意见，而非定于一尊不可，

那天在追查《镜报》的事时，有人问若水为什么不听劝告，非写文章不可，又追问他为什么要将文章拿到《镜报》发表，若水说：“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中宣部关于学习乔木同志的文章的通知是要贯彻执行的，所以才写答辩文章。”若水说，他与《镜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征求意见稿散发过多，承认这是他的不慎。追查无果而终。

此时的王若水已无职务，只剩下一个党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位将近 40 年党龄的党员作了个“劝其退党”的处分决定。

若水为此提出申诉，他沉痛地说：“落得现在这种下场，我并不后悔。党不要我，这不是我的错。我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我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仍然要以余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现代化尽力。”

王若水是哲学家、思想家、直言不讳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中，以深刻的理性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现在，若水走了，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走的。让我们记住他的遗言：宁做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责任编辑　钟　成）

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 殷 毅

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一

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某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

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

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

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当他 11 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环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二

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

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

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环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

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

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

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

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

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

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

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溢出幸福的泪水。

三

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

50年代初期的高启发

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

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铭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

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即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

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

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的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恨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

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

四

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瓦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招手——新街口社会服务处贴出伪首都警察厅招考报务员的告示，党组织决定让他打进去。他以原二厅中尉报务员的履历报名应试，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他被分配在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供职。

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转折关头，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警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高启发在警察厅电信科秘密开展工作，联系群众，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做好了一应准备。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各部门骨干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杭州方向逃窜。4月23日，南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无人管辖的真空城市。这一天，地下党空前紧张，空前忙碌。地下党警运会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命令中区警察分局维持北区治安，并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由于地下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全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均正常运转，金陵古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刻，高启发同其他地下党员一样，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公开身份，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要求各就各位，守护好机房和仓库。

4月24日晨，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军进入市区，立即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南京市军管会于大军进驻之日起开始办公。由于高启发和他所联系的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警察系统的通信网络当天全部开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稳定、治安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职务。

五

解放初期紧张而忙乱的工作甫告段落，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禁时时忆念起与L往日的恋情。一天，他利用现成的通信设备，拨通了L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L的妹妹。寒暄过后，他询问：“L埋葬在什么地方？”对方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具体在什么地点？”对方哈哈一笑，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L可能还活着，但以他和L相爱之深，他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于是，他拨通了北平市电话局长途台的电话，从那里他了解到：L活着，并没有死。

得此信息，他一时气愤得差点晕倒。他没有想到，被他深爱着的人会如此欺骗他，愚弄他。他给L写了一封长信，对她的背信弃义、虚伪欺骗作了尽情的斥责。信中述说了过去从未透露过的他此前加入地下党，以及如今的工作情况。不久，他收到L的回信。L在信中一再地向他认错，表示愧疚，请求他的原谅。L告诉他，遵照家中的安排，她已和一位教授结了婚。如果他不嫌弃她，她愿意同丈夫离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高启发太痴情了，接信后几乎来不及探究她因何背叛了他，也未及掂量已为人妇的L离婚来归的可能性，便全然原谅她了。

由此，他那已成死灰的感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与L频频书信往来。他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冲动，焦渴地盼望着早日与L见面，他向领导上提出了请假北上的请求。那时南京解放未及半载，无形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公安局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他的请假要求严词拒绝。不晓利害的他竟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主意：交代科内工作人员他外出两周，如果处长找他，就说他生病了。交代完毕，他跑到浦口车站买了张车票，便匆匆走了。

到了北平，与朝思暮想的L见了面。L泪流满面地向他忏悔，说只要他原谅她，她会同丈夫离婚的。面对她的热烈真情，他一往情深地表示原谅她的一切，誓言要和她厮守一辈子。

原来，当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际，L的以律师为业的父亲告诫子女：他们家族不得与国民党阵营有任何瓜葛——而高启发正是在国民党阵营供职的一员，尽管是地位卑微的一员。L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斗争，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可是她又不愿意伤害深深爱着她的人的感情，便编造出因交通事故身亡的谎言，意在让时间来消磨高启发对她的思念，渐渐将她淡忘。

两情缱绻，终不能久聚，过了两个星期，他和L只好洒泪而别了。

回到南京，党组织对他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了严肃批评，支部会、小组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自己连连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检

查。他以为,检讨结束了,日后好好工作,等待L离婚后就可以在南京结婚成家了。他在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天,全市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在当地的人民大会堂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着重指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反动中心,这里的地下党必然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市委对地下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整顿。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报告过后,他后半生的噩梦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你们在白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们去华东党校参加学习。”同时去学习的,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市电信局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连同他共计10人。但是,到了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却意外地得知来此的任务是接受审查,他发现自己已被看作混进党内的特务嫌疑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如雷击一般,将高启发震撼得目瞪口呆,泪如泉涌。

在华东党校一呆就是一年多时光,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唯独高启发被保留党籍。鉴于他曾犯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他们10个人回南京后,9人被公安局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高启发被分配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市委组织部宣布对他的工作分配时,并未说明因何对他降职使用;他呢,眼看同时受审查的9人被公安局铐走,也就不敢多问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投入监狱的9名地下党员——其中有的瘐死狱中,均获平反昭雪。)

后来得知,华东党校对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并未给予澄清,而是“暂时挂起来”。这一挂,随着往后年月党内“左”倾情绪步步高涨,便将高启发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

从接受审查时起,高启发同L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断绝了。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牵扯到这场说不明道不白的政治漩涡中来。后来分配工作,降职使用,“特嫌”阴魂不散,更令他心灰意懒,感到无颜再与L见面。

可是,命运常常会捉弄人。1953年深秋的一天,他偶尔路过新街口,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路旁的报栏前看报,其背影极像L,令他大为惊讶。他走过去细认,果然是她。一对两度反复的旧日恋人,此时双目相对,久久说不出话来。

L告诉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她随丈夫调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他也告诉L别后的坎坷遭遇,彼此黯然神伤!

六

高启发的“特嫌”问题久久解除不了,为“纯洁组织”,1954年整党时,所在单位党组织随意找了几条“罪名”,将他开除出党。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区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公开点名,指称高启发是“二厅特务”。在既无本人交待,更无任何旁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然给高启发定性为“特务”,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东门街小学当老师。在此前后,“左”风日盛,地下时期领导过高启发的一些同志,也先后受到整肃:他的入党介绍人、曾是他上级的李昭定,两度被错判入狱;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多次受到审查;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则被错打成极右分子。在此情势下,没有人能为高启发的“特务问题”洗刷清白,天大的冤案也只能由他自己背着。

转眼到了1957年,所谓“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开始。高启发经过1954年、1955年接连两次整肃,自知处境危殆,处处谨言慎行。但是,在一个只有20来名教工的小学里,不批判“二厅特务”还批判谁呢?区里某领导在会上公开说:“有的右派是骨子里反党,哪怕他一句反党的话不说,一件反党的事不做,他也是右派!”1958年9月,反右运动早已结束,全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天下午,区委组织部突然在东门街小学召开大会,通知他参加。没料到这个会竟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全区200余名教师早已严阵以待。区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大右派”高启发批倒批臭,一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慷慨激昂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发言者将事

先准备好的“莫须有”罪名，如一盆盆脏水，尽情地泼洒在他头上。平日谨言慎行的他，这时实在憋不住了，竟然昂起头来对那些离谱的不实之词一一加以批驳。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怒了会议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当场就有十余名壮汉一拥而上，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在主持者授意下，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硬拽着他的右手，在事前准备好的“右派”结论上捺上了手印。他被市整风领导小组“定为右派，撤销小学教师职务，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 44.63 元”，随即被发配到尧化门农场劳动。高启发后来知道，这叫做“反右补课”。

“文革”期间，高启发为少受皮肉之苦，先是东躲西藏，后来索性流浪到外地去了，直到武斗平息，才回到南京。“文革”后期，我路过南京，曾专程前去探望这位受苦受难的挚友，其时他正在栖霞郊区一所农业学校看大门，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告诉我，正患着肝炎，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只好带病延年。我邀他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彼此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谈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向往，恍若隔世，欷嘘叹息者久之。

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启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二厅特务”未得平反，因而党籍未能恢复。

80 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整理、出版当地的党史资料。1983 年初，高启发偶然看到一份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中共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斗争史料》，其中有两个自然段赫然载着他当年的斗争业绩：

“1948 年，地下党警运会党员高启发，经组织上同意，打入伪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按：即电信总台）这一特务机构担任中尉侦收员之后，摸清了敌台 A 系、B 系、E 系、K 系、F 系、O 系等台窃控我第二、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之后，及时向党汇报。原来我方所发出的军事电报，敌人几乎一份不漏地能收听到，自从该同志向党提供以上情报，我刘、邓、陈、粟领导的二、三野战军所属各纵队电台完全改变了波长呼号，因而伪国防部二厅再也侦察不到我军的军事情报了。”

“1948 年底，伪国防部二厅分向重庆、福州、台湾撤退。奉组织之命，高启发借故辞职，留在南京。之后他打入伪首都警察厅电讯科任报务员。他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发展报务员沙金华入党，争取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中青年报务员。1949 年 4 月 23 日晨，伪警察厅仓皇撤逃时，他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动员电讯科报务人员不要跟着敌人跑。经他动员，有三十余人在敌人撤退后的真空期间报到上班，保护了大批美制无线电设备（其中还有一些贵重的通讯器材）、警鸽、有线通讯器材等。解放军进城后，他向组织上保证，决不让全市警察系统的通讯中断一分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人民警察总队一成立，整个警察系统内部电话通讯全部畅通。这对于军管会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启发阅读这份材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感历史老人是公正的。

就在他看到这份史料后不久，1983 年 2 月，市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他家，向他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大意是：否定 1955 年市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所作的“二厅特务”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党龄、工龄均自入党之日（1946 年 3 月）算起；该同志原行政 19 级，现提升一级，为 18 级。市委组织部还考虑到高启发的具体情况，指示区里安排他一定的职务。惜乎时光不再，他已年近花甲，垂垂老矣。1983 年 3 月，高启发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

2000 年 1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放了反映南京地下党斗争的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其中第五集《虎穴奇兵》放映时，荧屏上出现一位白发苍苍老者的身影，他向摄像者指点当年的“虎穴”所在：“这里就是原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电信总台所在地。”这位老者就是高启发。但观众哪里会知道，这位苍苍老者，承受了人间多少的苦难！尤其是他立功而受辱的悲惨遭遇，直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责任编辑　程　度）

（此文选自作者书稿《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的附录，本刊作了删节。）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 傅国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一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6年，他在东渡途中与胡政之结识，在日本又结识了吴鼎昌等。留日五年，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

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40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7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二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仍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最终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事业。“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

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三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30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

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

张季鸾

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日《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四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

“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30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　吴　思）

王铃协助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 倪怡中

王铃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开创了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范例，为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协助李约瑟最终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铃长年身居海外，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晚年才回到家乡江苏南通，不久遽然病逝，因此他的事迹少为人知。

1992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来南通图书馆查阅《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才相识。他告诉我，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科技史，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这次带着妻子回来，买了房子，准备在家乡定居。王铃先生颇健谈，他还告诉我，台湾准备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陈立夫主持，他去台湾，陈立夫宴请他并邀请他当顾问。他到北京，周培源请他吃饭。他说如果两岸统一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好呢！

1943年由迁居四川李庄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介绍，该所助理研究员王铃认识了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很赏识器重年轻而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王铃，并推荐王铃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去剑桥大学留学。1948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在剑桥出版，紧接着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在这两本书中"李约瑟著"后面写着"王铃协助"。1971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三册中写着"得到王铃的特别协助"。1986年出版的第五卷第七册中写着三位合作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王铃。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

最初，这项如此巨大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却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李约瑟一面在基兹学院讲授生物化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王铃迫于生计，在澳大利亚谋得一教职，1957年离开剑桥。但他们的合作并未完全中断，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1958年6月，李约瑟与王铃合著的《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在伦敦出版；1960年，他们合著的《天文钟：中世纪中国的大天文钟》在剑桥出版。1971年、1986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四卷第三册和第五卷第七册。1988年8月，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学会议上，美国华人协会为表彰王铃、鲁桂珍协助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功绩，分别授予他们"为公奖金"。

王铃1917年出生于南通。祖父虽不富裕，却藏有许多古书。王铃从小就跟随祖父熟读家中藏书，15岁考入南通中学，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王铃不但学业优秀，而且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和陶大镛等人曾在重庆组织过"中苏问题研究会"，表

现了青年学子追求理想和进步的热忱。1946 年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竟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 60 多人。被激怒的进步师生举行声援大会，因王铃是中央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被英国人李约瑟所看重，所以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残酷镇压。王铃挺身而出与特务搏斗，以致颈部被特务用刺刀刺伤，他倒在血泊中。因为这一事件，郭沫若牢牢记住了这个正义、勇敢的青年人。解放后，郭老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想起了王铃，两次写信邀请王铃回国组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分别两次寄去 2000 英镑作为回国费用。因为种种原因，王铃最后未能成行。1959 年，印度政府组织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当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对此问题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40 多年前由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已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损害。现在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王铃当时身在澳洲，但他关心着祖国的边境。他对亚洲历史熟悉，他记得在英时曾在图书馆内看到前英驻印度总督府测绘的印度地图，其中的中印边界线和中国政府的划分基本相符合。为了给祖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赶往英国，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搜罗扒抉，寻找出封存多年的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复制后送交中国驻英机构。1962 年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刊出了 5 幅英文版《印度地图》。其中 1862 年印度加尔各答测量局办公室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部边境》图，图上中印两段边界标明在喀喇昆仑山脉，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另一幅 1917 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图上中印东段边界线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而不是“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依据这些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并赢得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如果说，陈寅恪提供的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证据，那么王铃提供的是英国（中印两国之外）第三国的证据，当然也是更有力的证据。陈寅恪、王铃都为自己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李约瑟和王铃的工作卓有成效。没有经费，他们兼职授课。时间紧张，王铃常常是边工作边吃早餐，他们在以后发现，他们的工作笔记中还粘着用餐时遗漏的肉皮屑。就连开车外出，两人也是一边开车一边讨论问题。乃至有一次，车门没有关好，飞驰的汽车拐弯时竟把坐在一边的王铃抛出车外，幸好没有受重伤。1992 年，王铃为庆贺李约瑟 92 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其时王铃也已 75 岁了。

添筹海屋祝希尼，
二美四难绩益奇。
绛帐康桥克士院，
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希尼指李约瑟初来中国时，人们称他尼达汉博士。“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四难” 说李约瑟兼科学、人文院士于一身；1943 年李约瑟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时，不辞辛劳，为中国购赠大批科学仪器和书籍；1967 年后李约瑟任基兹学院院长时，学者风范，平易待人，教授门房一视同仁；《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饮誉世界，政界、学界力主提名李约瑟为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候选人者不乏其人。四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李约瑟都做到了。

1994 年 6 月 6 日王铃先生在南通家中病逝。那天晚上他正伏案写杨振宁、谢希德等老友屡屡敦促他写的《李约瑟传》，突然感到心脏很难受，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王铃先生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老师。消息传到英国，李约瑟老泪纵横，他和研究所全体成员拍来唁电。9 个月后，李约瑟也与世长辞。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 张椿年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纪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财富观主要来自《圣经》，经常被教会和神学家引用的经文有以下一些。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以上引文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家根据这些经文向世人宣传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积累财产与信仰上帝是对立的，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只有守贫才能接近上帝，世人应该学习基督，基督没有财产，他为了拯救人类，过着赤贫的生活。阿奎那说：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才是获得上帝的爱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中世纪的一切僧团的组织章程都是以守贫作为其基本原则，托钵僧甚至以游乞为生。

基督教把守贫视为美德，把贪婪视为罪恶。因为人的贪婪产生了现世的财产，从而使人不爱上帝，不爱人类，所以贪婪应该受到永世的诅咒。当商业发展起来后，教会认为商业就是一种贪婪活动。由于商业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在中世纪教会对商业历来不赞一词，更不用说对高利贷了。高利贷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教会把银行、钱庄和私人放债统称之为高利贷。高利贷虽是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一种表现，它却很易招致社会的不满，因为受高利贷盘剥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小私有者、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他们怨恨债主苛刻的利息。神学家和教会认为高利贷者不付出任何劳动，甚至在他们酣睡时还在收取暴利，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当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教会对它的谴责也越来越猛烈。

守贫斥富的观念得以在中世纪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中世纪是个财富不均的社会，《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的思想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情绪。然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社会的现实，所以只能把对尘世的希望寄托于天国，于是有了“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其次，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流传至今的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海盗将抢劫来的财宝藏之于深山或埋之于海岛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守贫思想得以存在的又一原因。

然而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财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商业，社会的生产规律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均为欧洲有数的几个大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纪中叶，柯西莫·美狄奇和乔凡尼·卢西莱依的家产都在100万佛罗林以上，是全欧最大的富翁。

15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不是商人，没有周游世界，没有阅历异国的风土人情，没有携带一笔钱财回到佛罗伦萨，就不能获得荣誉。""崇高"这个形容词在中世纪只用于贵族的打猎、练武等等的活动上，现在贩卖呢绒的职业也被认为是崇高的了。

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不能不发生变化，不能不与传统的基督教的伦理观、财富观发生冲突，不能不对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

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首先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因为他们最早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才能带给人以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他们认为发财与信仰并不矛盾，开始把发财与信仰协调起来。我们在商人遗留下的账本中，常可读到以下一些祷文：

"为了耶酥基督，为了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愿他们怀着宽大和仁慈之心赐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得以拯救。"

"但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的收入。"

"为了上帝，为了成功，为了利润。"

15世纪6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商人巴洛·达·切尔塔尔多写了一本名叫《良好的习惯》的书，规劝一些生意人不要因为个人的各种杂念而放松发财的意志。他希望商人，"决不松懈发财的努力，不要说什么：即使我今天还活在世上，明天我将离开人间，我不愿在身后留下丰厚的财物，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的双亲也不爱我。他们是这样性情的人，纵然我给他们保留整座城市，他们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荒唐地浪费、滥用和消耗光。因为你不知道是否长寿，所以不晓得自己的命运。事实上，我目睹了光荣的国王、高贵的领主、富有的市民和商人尚在本人健在时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从而过着贫穷的生活。"

发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不少富人因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遭受破产。著名的巴尔济·彼路泽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是英王爱德华三世拒付借款。然而对于切尔塔尔多这样具有进取心的商人，虽然风云难测，仍不屈服于命运，为了发财，甚至不怕遭到灵魂永坠地狱的谴责。商人法兰西斯科·达蒂尼一方面渴望发财，同时又害伯来世的苦难，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前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主要指望人，不是指望上帝，人们为此会好好给我以报答。"

人文主义者对待财富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彼得拉克的财富观继承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思想，他认为财富只会带来危害，是不幸的根源，人们叫做财富的东西，对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既不是幸福，也不是值得尊敬的东西。从思想的深度来说，彼得拉克对财富的认识还没有突破阿奎那的理论。但是他对贫穷的看法与基督教的守贫观又有所不同。基督教的守贫观是禁欲主义的核心内容。彼得拉克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的：人应该经受住命运和贫困的打击。他说："有道德的人不应该陷于对贫困的诉怨。"彼得拉克的观点接近于斯多噶派的观点：人应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考验。

对财富、对商业的看法发生转变始于萨留塔蒂。自他之后，人文主义者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富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

萨留塔蒂认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繁荣归功于手工业和商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事。他说，由于有了行会，像他这样的人才得以有今天的样子。我们知道，萨留塔蒂在担任文书长的职务时享受着公社政府给予的最高待遇，他是佛罗伦萨有数的富户之一。萨留塔蒂看重商人，他认为商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石，没有商人，人们就不能生存。萨留塔蒂的看法，反映了佛罗伦萨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布鲁尼针对禁欲主义者宣扬财富的本质是罪恶的观点，认为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他从政治斗争中看到财富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布鲁尼说，被阿尔比奇驱逐在外的美狄奇家族于1434年之所以能

够返回佛罗伦萨，迫害反对党，就是因为他有大量的钱财，能用金钱收买小店主、丝绸商以及其他挣钱谋生的人来反对他的敌人。布鲁尼认为，谁有足够的钱把一般的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谁就是可怕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布鲁尼是一位学者，他认为财富对学术活动有利。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财富是哲学家的朋友。哲学家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从恐怖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才能潜心研究。

布鲁尼不仅肯定了财富是一种外在的幸福、外在的力量，还认为财富是道德的基础。他说，没有财产，德性是无力的，哲学是经不住风雨的。

与布鲁尼相近似，布拉丘利尼、帕尔梅利和阿尔伯蒂也是把财富的社会意义作为自己的论证重点。

布拉丘利尼写的《论贪婪》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财富观念。《论贪婪》的原文是拉丁文的“DE AVARITIA”。“贪婪”在中文中是一个贬义词，在布拉丘利尼的文章中，主要指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尤其指追求金钱和发财致富。因此，中文贪婪的概念不能完全表达“DE AVARITIA”中的意思。

《论贪婪》是用对话的体裁写成的。文中的对话人物围绕财富和发财致富这个中心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反对，有的持中间态度，赞成适度地追求财富。参与争论的安东尼奥·洛斯基（人文主义者、外交家，1365—1444）则对财富的社会意义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禁欲主义者的财富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布拉丘利尼在文中虽未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把洛斯基置于争论的重要地位，联系到他在《反对伪善者》一文中揭露僧侣阶层的游手好闲和不劳而食；在《论高尚》一文中斥责贵族的寄生生活和肯定劳动的价值，这就说明了他倾向于洛斯基的观点。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他借洛斯基之口而发表的一些言论。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拯救灵魂。他认为贪婪财富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他说：“人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金钱，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着获取利润，获得更多利润的欲望。如果弃绝了这个欲望，一切事业就会完全停止，要不指望获利，还有谁来从事任何一项活动呢？财利越明显，我们越愿意做任何的事，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利，所有的人为了财利而努力。”又说：“如果你观察一下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是为了得到钱，为了金钱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

洛斯基尖锐地指出，教士们的崇高的善行也不是帮助有罪的人超脱尘世。他问道：“对我们显然热心过分的教士能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在信仰的掩盖下没有其他别的目的吗？难道不是为了少出力而又成为富翁吗？他们决非因为内心不安，他们一点也不害羞，为了发财赤裸裸地追求所谓的善行，而我相反地把它叫做对心灵的残暴行为。”

洛斯基用贪婪来代替基督教的净化灵魂，这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产生。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贪婪是无罪的，这是根据人们自然需要得出的结论。他说自然使许许多多有生命的活东西渴望保存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欲望的驱使下，人们谋取食物，关心身体。而金钱给人们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没有钱，没有金子和银子，就不能有什么东西，因此人们如果渴望金钱，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洛斯基要人们注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看一看孩子：他们得到作为礼物的钱币后的那种喜悦。再看一看年轻人、成年人、老年人、富人和穷人、国王和当政者——所有的人都一样地喜欢金钱和追求财富，这一切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然造成和教会人们善于凭借金钱获取维持和保存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因为一切为自然所迫使和鼓励的东西都遵循着这样的欲望，所以就不能宣告贪婪有罪。”

洛斯基把贪婪等同于人的自然欲望，认为所有的人对金钱的渴望也是自然给予的。既然是自然在人们身上养成的东西，就是必要的、有益的，就不应该受到谴责。这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理论根据，也是鼓励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宣言。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对它不应该轻视。洛斯基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人们为了商业和交换，发明了钱

币"这句话来说明金钱有利于社会。他把金钱比作是维持国家的神经。他认为,"凡是贪婪者很多的地方,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骨骼和基础。"他指出,贪婪者不仅能以自己的财富帮助人们,而且以他们的忠告、经验来帮助人们。他们还"创造美,给自己的城市带来光荣,如果不说先前的例子,那么在我们的时代贪婪者用自己的钱建造了多少富丽堂皇的住宅、非常美丽的别墅、庙宇、敞廊、医院!没有他们,城市就会失去它最雄伟的和最美丽的装饰物。"

洛斯基实际上否认了贪财往往是贪婪者道德败坏的客观原因,把贪婪看成是天然的美德,这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的最突出的表现。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反对守贫。他认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最基本的需要,社会的富裕、人类的美德都要求生产更多的东西。他说:"如果每个人的劳动成果不超出自己的需要,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需去耕地,其他什么也谈不上,那时谁也不会生产超出他本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不比他本人已感到满足的还要多,请看,那会出现怎样普遍的混乱。人们就会失去必要的美德,就会丧失怜悯和同情心,谁也不可能以慷慨和善行而著称。事实上,手中没有殷余的物品的人能有什么可以给予他人呢?一个人拥有的东西仅仅只能满足他一个人,能成为慈善家吗?"

"如果每个人仅仅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城市就将失去其全部的光辉、美丽、豪华,也不能建筑任何的庙宇和敞廊,所有的艺术就将停止,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就要陷入混乱状态。"

洛斯基不仅认为财富是国家昌盛、文艺繁荣的物质基础,而且认为它是人类发扬美德的前提,他认为贫困才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对那些声称能满足个人需要就足够了的人,洛斯基一针见血地揭露道:"我想提醒你们,在那些人中有那么一些无聊的、无礼的伪善者和游手好闲的小丑,他们以信仰上帝为掩护,过着不劳动、不流汗的生活,他们对别人宣传守贫、轻视财产时,本人却获得了最丰厚的收入。"

洛斯基对基督教守贫观点的无情揭露,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追求财富是正当的行为。瓦拉在《僧侣的誓言》一文中则是从快乐主义的原则出发来评论财富问题的。

瓦拉不承认基督教的伦理观是必须遵守的唯一的伦理观。他说:"既然我们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状况方面又怎能相同呢?你被迫遵守贫穷、禁欲、顺从,我没有。所以你有你的行为,我有我的行为,你有你的道德,我有我的道德。"

既然有两种道德标准,就不能强求人们一律过贫穷的生活。他愤怒地说:"你想用守贫、节欲、顺从三种德行使我们就范,这是不能容忍的……道德不仅表现为忍受贫穷,还表现为合理地使用财富;不仅表现为节欲,还表现为结婚;不仅表现为顺从,还表现为聪明的指挥。总之,一部分人具有这样的道德,另一部分具有那样的道德,任何人不能两者兼而有之。"瓦拉反问道:"如果我能无瑕疵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使自己赤贫地度日呢?"

瓦拉激烈地抨击放弃财产的说教,他说:"还有什么比把一切分给穷人……然后自己去行乞更为荒诞的呢?""如果你把金钱给了穷人,你就是一个既不爱自己,也不爱亲人的愚蠢者。"瓦拉说:"你献出自己的钱财,那么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享受别人的",因为你将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瓦拉一再坦率地声明:"我需要古代手抄书,为了购买很多的古代手抄书,我需要不少的钱和其他的生活资料。"瓦拉是一个学者,他认为进行学术活动必需有书、有钱,金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之一,宣传放弃财产只不过是虚假的表现而已。

与瓦拉不同,帕尔梅利十分强调财富必须对社会有益。他认为,人结成社会为了两个目的:荣誉和利益。荣誉是利益的准则,道德是荣誉的保证,致富要用正当的手段,过高尚的生活要有丰厚的经济来源。道德纯正,为社会服务说明致富的目的是正确的;慷慨大度,热心公益事业说明生活是高尚的。他说:"凡从事有益的社会劳动,以财富著称的人,不应受到责备,而应把他们作为值得尊敬和有用的人来支持。"帕尔梅利激烈反对以权谋私的人,主张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利国

家。他要求把国家的、个人的利益树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他视农业为一切福利的基础,手工业是人能尊严地生活的依靠。商业,尤其大商业是国家和私人发达的保障。帕尔梅利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劳动致富不仅为了个人,也是为了他人,尤其是为了国家。

阿尔伯蒂也有类似于帕尔梅利的某些思想。他认为,“大多数人是为了财富而工作”,但是财富不是最后目的,只是获得声望和荣誉的一种手段。

阿尔伯蒂最卓越的见识表现在对商业和商业利润的分析上。文艺复兴时期,始终有人认为,买卖和信贷旨在赚钱,所以是下贱的职业。阿尔伯蒂针对这种观点说道:“销售只不过是交换,你为买主的需要服务,你就获得了为酬谢你的辛劳的报偿,你得到的是高于你付出的东西的价格的差额。这样,你真正出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你的劳动,你把商品交换成钱,你得到超出批发价格的部分是为了支付你的劳动。”阿尔伯蒂把劳动作为价格的一部分,非常现实地解释了商业利润的来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能对阿奎那的高利贷之所以不公道,因为它等于是出卖了不存在的东西的理论,作过很有力的批判。现在,阿尔伯蒂拨开了这位神学家所散布的“公正价格”的云雾,为利润提出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为商业真正“恢复了名誉”。

阿尔伯蒂同样反对把从事金融业看成是唯利是图,无信义可言,是正人君子应该回避的肮脏勾当。他反驳道:“如果获得财富不是和那些比较伟大的职业同样的光荣,那么也无必要轻视自然未赋予进行壮丽事业的特殊品质的人,和致力于本人不能胜任每个人都认为最有利于全体国民和家庭的事业的人。为需要供应的人服务,财富就能赢得友谊和赞许。为崇高宏大的事业使用财富,财富就能带来名声和威信。我们从日常的经验中知道,在急需和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本国公民的财富对你的国家有用。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支持那些仅靠国库支付工资的,用武器和鲜血保卫国家自由和尊严的人。共和国的威信和统治权也不能增大。”阿尔伯蒂明确地表明了,只要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发财非但无罪,而且能带来名誉和声望,财富也有了道德上的价值。

阿尔伯蒂用自己家族的历史来驳斥一些人瞧不起能赚钱的职业。他说,阿尔伯蒂家族擅长各种职业,包括与金钱有关的职业。它行事诚实,光明正大,在协议中决不弄虚作假,无丝毫违法行为。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意大利以外,在西班牙,在西方,在叙利亚,在希腊,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阿尔伯蒂家族被公认为伟大的商人。它从来都关怀祖国。佛罗伦萨1/32的支出是由阿尔伯蒂家族供给的。因此,它在人们中间赢得了名誉和威望,虽然它在国外的名气比国内还要大。

阿尔伯蒂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为不损人的、正当的敛财进行辩护,认为财富掌握在高尚的人手里能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

阿尔伯蒂对财富的论述,充满理智,具有经济的眼光,可以说是对他的家族历代从商的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所论述的人文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因此,我们关于人文主义者财富观的介绍可以在他这里打上一个句号。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看到人文主义者的财富观不尽相同,不过在汇成冲击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洪流中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帕尔梅利的思想为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起了酝酿的作用,布拉丘利尼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前奏。

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财富观,主要是人文主义者的财富观时,既要看到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情况,也要看到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原始积累时期,处在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贸易需求的前夕。对于这一时代,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颂扬金钱,成了冒险的商人、狡黠的银行家、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的最根本的生活原则。贪婪由罪恶变成美德,贪婪者由祸国殃民的蠹贼变成歌颂的对象。于是一部分人无限地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又迅速地贫穷下去,然而新的财富观的确鼓励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去追求积极的生活理想,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人们从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因此,新的财富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程　度）

内山完造

“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 高 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间，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内山完造和他的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于1885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芳井村的一个平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在高等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即退学，到大阪和京都的商店里当学徒，做店员。27岁时入基督教，1913年来到中国上海，当了“大学眼药”的推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等地作广告宣传。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广大人民生活在极为贫穷和苦难的深渊里。目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由平民出身而又充满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内山完造，开始萌发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感。

1917年，内山在日本同井上美喜子结婚后回到上海，夫妇在上海的内宅开设了内山书店，开始销售一些传布基督教的书，后来大量推销供一般群众阅读的一日元一册的各种知识丛书。这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孕育和发展。内山完造夫妇感悟到中国广大青年急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食粮，及时地扩大了书店的经营，增加了许多适应中国青年需要的有关社会科学理论和进步文艺方面的图书。这种有针对性的机动灵活的经营思想，加上他们夫妇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逐渐使书店成为上海外国人开办的书店中最受欢迎、影响最大而且营业额逐年上升的一家。

增进文化交流传播进步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使中国的进步思想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全民族的觉醒空前高涨；另方面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猖獗，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占领。内山完造作为一位正直的商人和真诚的友人，开始相信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必将发展，决心把内山书店办成一个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进步文化、供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据内山完造回忆，李大钊、陈独秀等曾是内山书店的顾客。1927年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第三天，即到内山书店买书，从此与内山相识，结为好友。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的图书在一千种以上，其中大部分为日文进步书籍，包括：《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要约》、《马克思读本》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另据不完全统计，仅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有330余种的原版书来自内山书店，鲁迅、郭沫若、田汉、冯雪峰、陈望道、夏丏尊、夏衍等是这些书的主要译者。内山完造还通过日本出版界的朋友，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左翼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为此用日文写了《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和《肖军简介》等。30年代初，瞿秋白曾与鲁迅共同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特地把瞿秋白大量优秀的

译文编集成《海上述林》一书，并把此书在上海排版打好纸型后，由内山完造设法在日本复印出版，然后运回中国由内山书店代售。在内山完造的推动下，日本还出版了日文的《阿Q正传》以及由鹿地亘等参与翻译的《大鲁迅全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左翼力量进行文化“围剿”，许多进步书刊严禁在中国人开的书店出售，内山书店却公然出售鲁迅等许多进步左翼作家写的或翻译的革命进步书刊，如苏联长篇小说《毁灭》、《铁流》等。

内山完造和鲁迅在上海

内山完造还出版发行了一份杂志《万华镜》，使之成为中日作家和文化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的阵地。他还通过书店创立了有关文艺和文化的“漫谈会”，吸引进步青年读者参加，并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及日本一些文化名人主持或举行讲座。在30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内山完造克服困难，通过书店先后邀请日本一些进步作家、记者、文艺评论家、教授学者等数十人，到上海分别会见了鲁迅和其他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增进接触和了解，共同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革命者可信赖的朋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的上海，是中国革命力量和左翼文化运动者集中和活跃的地方，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以上海为重点，极力破坏、“围剿”和扼杀这些革命力量和人士。内山完造不顾个人安危，除坚持办好内山书店外，还利用书店全力掩护这些革命者，使他成为中国革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

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常到内山书店借书，与内山结为好友。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辗转来到上海，曾栖身于内山书店；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经香港秘密来到上海，不久被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发现，内山亲自掩护郭上船去日本。

鲁迅在上海，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内山完造多次帮助鲁迅全家转移，住在以他的名义租下的房子里。“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鲁迅住宅陷入火线，内山立即帮助鲁迅全家移居到内山书店一位日本店员的寓所，并在门口挂上这位店员姓名的木牌。

1930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遭反动当局通缉，从南京逃至上海，在内山书店避居，后赴日本。1933年3月至5月，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危险，受鲁迅委托，内山完造夫人设法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了一间亭子间，帮助他们夫妇临时避难。

内山书店是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秘密场所。方志敏1935年1月在江西同国民党军作战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的“遗信”和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是托人带至上海内山书店，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共中央的。1936年2月，也是经内山书店，鲁迅约见了从北平来的东北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蜕（即邹鲁风），并且代他设法转递了中共北方局给党中央的报告。

内山同情并全力帮助中国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受到日本军部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怀疑和监视。大量的流言蜚语传来，一些中国的反动文人也借机大肆攻

击鲁迅同内山的密切交往。对此,鲁迅曾理直气壮地严加驳斥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见《伪自由书·后记》)

在最为严峻和悲痛的岁月里

从1933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形势最为严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年代。鲁迅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下坚持战斗,身心受到损害,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内山倾心全力关怀、照顾着鲁迅。1936年夏,鲁迅的健康和处境更加恶化,内山和一些友人劝说鲁迅到日本疗养并暂避险境,鲁迅经再三斟酌未去。这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发病,病情急剧发展。这时,他仍想着内山,用日文给内山写了封便函,速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内山马上照办了,这封信成了鲁迅致内山的绝笔信。19日凌晨5时,鲁迅终于因病不治与世长辞。内山闻讯立即赶来,痛哭着向鲁迅告别。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又把侵略战火烧到上海。内山夫妇目睹自己国家派出的侵略军屠杀善良的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羞耻和内疚,心情极为痛苦。他们停止了书店的营业,暂回日本。直到1938年5月,为了谋生,又返回上海,内山书店复业,但经营范围大大缩小。这期间,内山主要埋头写作,他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等五本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描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寄托着他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1945年1月,他遭到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的爱妻美喜子不幸因病逝世。

这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给内山带来无限的欢畅和希望。他同上海居民和书店店员一起欢庆抗战的胜利,并期待着胜利后的国民党当局能够重建上海。不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不仅蛮横贪婪,四处“劫收”,而且也接收了他的内山书店。但他不灰心,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一些书籍,开设了一家专卖旧书的“一间书店”。他还参加了中国进步人士和群众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等活动,并协助由许广平主持的整修鲁迅墓的工作。1947年12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当局用强制手段,以“亲共分子”为由把内山“遣返归国”,实际上是把他驱逐出境。

为日中人民友好辛劳奔走

内山回到日本家乡时,正值严冬季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的侮辱和无理对待,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强了他热爱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日夜考虑的是怎样使曾处在长期交战状况下的日中两国人民消除隔膜,增进互相了解和友谊。他决心周游日本全国,亲自向日本人民讲解。 1948年2月,他开始了“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在1948至1949年,他历访了日本全国,周游一年零五个月,演讲达800多次。他每到一地,总是以“内山式”的漫谈方式,从家常话谈起,联系他在上海生活30多年的丰富体验,并不时引用鲁迅的警句名言,使听众对中国产生好感,关心起日中友好事业来。他还写作出版了《相同血液的朋友啊》一书和他的自传《花甲录》,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思念,表达了对日中人民友好的殷切期望。

如何推动日中友好事业,开始时,内山曾设想从促进两国贸易入手,参加了日本商业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他被选为代表委员。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东方出现,内山极为兴奋。他根据形势发展,联系各界对华友好人士,在东京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发起人大会,提出了要为拥有100万会员而努力的目标。接着,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这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包括爱国华侨的代表)共1000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选举内山完造为协会理事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决心实现日本人民给予他的神圣使命,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不懈努力。

当时日本处在美军占领下,执政的吉田内阁屈从美国的旨意,不仅敌视新中国,拒绝同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且于1952年4月28日同台湾反动集团缔结了所谓“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这使刚刚成立的“日中友协”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使内山完造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在此后的各种活动中,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他明确表示:“日本的自我反省是解决日中关系的根本途径,日中友好运动是拯救祖国的运

动。”

在为日中友好事业奋斗的同时，内山还时时刻刻怀念着鲁迅，在日本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各次纪念鲁迅的活动。1950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会，并作了《回顾谈》的讲演。1951年9月，日本文化界人士召开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内山作了《论鲁迅》讲演，全面阐述了鲁迅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对日本人民的伟大友谊之情。

他安息在中国大地上

我第一次同内山完造老人见面并相识，是1953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从日本来访北京的时候。新中国成立时，仍有3万多日侨滞留在中国，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和船只缺乏，他们不能实现回国的愿望。中国政府本着革命人道主义和对日本人民友好的精神，在中日两国无邦交和无法进行官方联系的情况下，决定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问题。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内山参加了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前来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个日本民间代表团访问新中国，也是内山在阔别上海六年之后第一次到新中国访问，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奉命前去广州罗湖口岸迎接日本代表团。此时他已68岁高龄，穿着一身和服，戴着黑边眼镜，身子有些瘦弱，但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我青年时读鲁迅著作略知他的为人和友好事迹，因此见到他倍感亲切和敬重。在列车上，他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汉语同我交谈，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向往，问了我许多关于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他还回忆起过去在上海同鲁迅在一起的岁月。

1月31日，日本代表团到达北京，受到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和顾问廖承志等人热烈而亲切的欢迎，他还兴奋地见到他的挚友郭沫若。在双方关于日侨回国问题的会谈中，他多次发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无数罪过，一再感谢中国方面在协助日侨回国方面所给予的一切优厚照顾。他还特地带来日中友好协会给毛主席的一封致敬信，信中表示：日中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友谊和新中国伟大和平建设的成就，必将粉碎一切反动派破坏日中友好和亚洲和平的阴谋。经过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中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联合公报。为了尽早回国部署迎接日侨的工作，日本代表团于3月6日离京回国。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内山同日本各界友人在各地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东京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内山在致欢迎词时说：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像兄弟一样。不幸过去的日本侵略战争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中国人民把日本军阀和日本国民分开看待，始终向日本国民伸着友谊的手。日本人民决心排除一切阻碍，同中国人民握手，为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运动努力前进。

1956年10月19日，内山再次应邀来京，对新中国作第二次访问。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然后去上海瞻仰了鲁迅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到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百草园。他见到许多以往的老友，共同欢畅地重温了昔日的友情；他还到上海万国公墓祭扫了亡妻美喜子之墓，悲喜交加的心情难以表述。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地邀请内山老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这时他已74岁高龄，健康欠佳，然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临行前还同亲友们一起合影。在他9月19日到达北京时，突患脑溢血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日病逝北京协和医院。得此噩耗，他的所有中国友人都陷入无限的悲痛中。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阳翰笙、田汉、许广平、梅兰芳等200多人参加。按照内山生前的遗愿，他的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于10月26日在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如今，镶嵌着内山完造夫妇照片、铭刻着他们夫妇姓名的内山夫妇双桥合葬墓，永恒地坐落在上海大地上；在墓碑前面平放着一本大理石做成的书，翻开的书页上刻着他们的好友夏丏尊题写的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在日本的井原市矗立着内山完造的铜像，和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廖承志题字：“内山完造先生颂德碑”。每逢内山先生诞辰和逝世周年纪念时，都有大批中、日友好人士和群众来到他的墓前和碑前进行悼念。内山完造老人永远活在中、日人民的心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德国“巧克力大王”的中国情

● 李世隆

1996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来到中国美术馆，参加了“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的开幕式。路德维希夫妇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价值 2700 万美元（2 亿多人民币）的 117 幅欧美现代艺术品（包括 4 幅毕加索的作品）无偿地赠送给了中国。我作为中德艺术交流中这一大事的参与者，深为这位世界级艺术收藏家的那份中国情所感动。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95 年，我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这年 1 月初，梅兆荣大使要我代表他去会见人称德国“巧克力大王”的路德维希。我们到一家餐馆里面边吃饭边谈。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并代表中国大使邀请他访华。他马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我深表谢意并乐于接受中方邀请。虽然我的助手恩斯特博士已向我讲述了他访华的美好经历，但我必须做准备，希望从您那里得到中国官方的介绍材料，我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有自己的理解。”从这时起直到 1996 年 7 月 22 日他突然病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主动向我索要有关中国的资料，政治的、经济的、文学艺术的，也不管是书籍、刊物、画册他都看。他说：“我不但要了解而且要理解您的伟大国家。”

会见后的第三天，他就写信给我，决定 4 月底访华，信中写道：“我们少年时代就在父母那里接触过中国古老的艺术与文化。在科隆东亚博物馆中就有我一部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并将向观众开放……它的伟大的历史和几千年古老文化令我敬佩，它正在从事的事业和成就令我惊叹。作为一个德国人，我由衷希望，为加深和推动德中两国间在艺术和博物馆方面的相互了解略尽绵薄之力。”4 月 20 日他又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学习有关中国的资料，热切期待着对您的伟大国家的访问，希望能是一个文化合作的开端。”

为了使国内有关单位和个人能更好的更有目的地接待路德维希夫妇，我和使馆文化处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路德维希的生平资料，并及时向国内作了报告。

路德维希是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中崛起的著名企业家，人称“巧克力大王”。然而他与很多富豪不同的是，他不买高级汽车、豪华游艇、豪门别墅，而是以大量的资金收藏世界各国的艺术品，累计达 6000 多件，价值数亿美元，成为三大世界级艺术收藏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毕加索作品收藏者（共 835 件作品）。他与其他艺术收藏家的不同之处是，他的收藏品不是放入私人收藏室，而是运进博物馆，供公众欣赏。路德维希是博士、教授、学者。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毕加索的人物形象是一代人的生活感受》。他一生发表过 70 多篇有关艺术的文章。路德维希的巨大丰富的艺术收藏和把收藏无偿地借展和捐赠给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行动，赢得了国际有关各界的普遍尊重，被巴塞尔大学、莱比锡大学、索菲亚大学、美国普林顿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哈瓦那艺术学院、科隆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和彼得堡艺术院名誉院士称号，全世界有 20 多家艺术博物馆以路德维希的名字命名。他三次获得德国大十字勋章，还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奖章、奥地利科学艺术一级荣誉勋章、威尼斯城金钥匙、匈牙利金星勋章、古巴民族勋章等 48 枚国家和城市的勋章和奖章，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和里根、戈尔巴乔夫、日夫科夫、施密特、科尔、洛克菲勒、达里等政要、巨富、艺术名家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名流，你和他交往，却感不到一点傲气和霸气，更多的是诚恳和坦率。一次我和梅兆荣大使去他家里拜访，当我们谈到他对艺术的贡献时，他淡淡地说：“这是我们生命

的一部分,没有别的。”1996年5月初我遵中国美术馆杨力舟的嘱咐,为路德维希夫妇捐赠艺术品在北京展览写一篇介绍他们夫妇的文章,当我把文章草稿传真给路德维希阅改时,他不但做了认真的改动,还于1996年5月13日特意在退还稿件时附信告诉我说:“我的夫人和我对您所写的文章深为感动。我所做的修改只是建议。您若不采纳也绝无妨碍。”这是他生前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两个月后他就因心脏病而突然去世,实在是令人悲痛和怀念。

1995年4月下旬路德维希夫妇应文化部、中国美术馆的邀请在中国从北到南进行了考察访问,对中国有了切身的体验和进一步的了解。回国后在接受北德电台的专题采访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第一次访华,我夫人17年前去过那里。我们激动地发现,这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家,这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国家,目前正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确信,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的迅猛发展,有赖于一个聪明睿智、慎重周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一面坚持社会主义,没有这一点,——作为资本家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无法将这么大的国家带入将来的;另一方面——这是非常明智之举——,有选择而不失控地释放人们的自主首倡精神,……个人创造力在共产党手里以独特的方式被激发出来,实在是美妙无比。中国仍然保持自己的国家体制,避免了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灾难,这是非常明智的。”

1995年10月梅兆荣大使为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一行访德举行宴会,德方外交部国务秘书和相关的司长出席。为让李铁映同志借此机会认识路德维希教授,所以特邀路德维希出席。席间中德双方谈及人权问题,虽气氛友好,但观点各异,争辩热烈。路德维希一直保持沉默。当服务员端上宴会名菜——北京烤鸭之后,争论顿时缓和下来。这时路德维希从座位上缓缓起身说道:“今天在座的都是外交官,政府高级官员,唯我是一介平民,不揣冒昧,也想就人权说几句。人权我们必须维护,但不应该有多重标准,不能对某个地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他还举出具体例证,恕不点出——作者)而对另一些地方则激烈批评,甚至于使用制裁等手段,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笔者对路德维希教授这种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格至今敬佩不已。路德维希对人权的观点是一贯的,1994年他在《写给〈世界报〉》一文中就写道:“宽容和对他人意见的尊重,也属于人权的范畴,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其他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却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给他们住房和医疗保健,以及相对比较低的失业率。……如果中国的个人人权也如我们这儿一样实施,这个国家也许会因为缺少有效的权威而走下坡路,那么中国将会怎样呢?前苏联的发展不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吗?……人权问题不要成为制裁的操纵杆……”

1995年一年内路德维希两次访华,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广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受到了文化部领导、中国美术馆杨力舟馆长和各地文化界的热情接待,接触了各地的中国美术家,还选购了不少当代中国美术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和年画等。他在机场一见到我

1996年4月路德维希访华,与中国美术馆草签捐赠协议(左一为本文作者,左二为路德维希)

就兴奋地讲述他的访华经历。他夫人在一旁悄悄地对我说:“他对中国着迷了。他变了,变得罗唆了。”的确是如此。1996年3月他在第三次访华前夕接受采访时,就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两次访华的观感。这里只能摘其要点。在问及为何对中国感兴趣时,路德维希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和我的夫人。我的岳父收藏了很多中国古老的艺术品,此后我们不断地扩大收藏,现今这些艺术品都收藏在科隆东亚博物馆。对于中国文学,我们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也正在努力理解中国人的思想。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尽力了解当代中国及其文化和艺术。……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中国。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史无前例的觉醒令人敬佩……我和我的夫人不仅着迷于它目前令人惊异的经济实力和所取得的以及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更着迷于他的文化。中国是最古老的文化国家之一,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数千年的历史、哲学和艺术也给了当代中国人振兴国家的力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无法撇开历史来理解。要解释现代中国也应该与其几千年的历史相联系。”

在问及他们夫妇为何特别钟情中国现代艺术时,路德维希说,艺术总是折射着其赖以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当今的中国尚刻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烙印。在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受到外国强权的压迫与剥削。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此后几十年的道路有成功也有挫折。直到80年代起,中国才获得了迅速发展,贫困和饥饿基本消除,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人很为他们的历史而骄傲,同时他们现在把目光转向世界,开始在世界大家庭积极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中国现代艺术中反映出来。我们现在所收集的中国现代艺术品,仅仅是个开始。我们不仅收藏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展出的作品,更要收藏那些表现中国人自己的,在国内评价较高的艺术作品,为此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也需要走,我们也需要中国方面的咨询。这段话使我想起1996年3月他第三次访华在美术馆观看年画展时的情景。那时适逢我在国内休假,参与了接待和捐赠协议的会谈。当他看到一幅周总理与儿童在一起的年画时,转身对我说:“像这幅画,就是你们那一段历史的反射。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我都收藏了,尽管有人反对。就艺术史而言,它与60年代美国波普艺术有同样价值。可惜杨力舟先生是不会出手的。”

1996年2月至6月,德国一些反华势力在当时的德国首都波恩组织了“西藏艺术展”、“中国现代艺术展”和邀请达赖喇嘛访德,以关注所谓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为由头,掀起一股反华浪潮。中国大使馆事先把这些情况向路德维希作了通报,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首先宣布辞去“中国现代艺术展”名誉主席,拒绝为该展览写前言,反对利用此展览丑化中国。同时他还给当时德国总理科尔写信劝阻总理和总统出席该展览开幕式。当达赖喇嘛访德时,1996年6月18日路德维希夫妇不顾德国政界和舆论界的重重阻挠,自己出资,在报上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个宗教集团(指达赖集团)从来没有资格来谈论西藏的民主自由。从国际法来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么看的。波恩西藏研讨会的组织者瑙曼基金会承认的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只不过是达赖喇嘛自己的创造。达赖喇嘛和他的前任在西藏实行僧侣宗教统治,人民根本无法参政。北京清楚地记得,那些今天在大谈人权问题的某些大国,曾经对中国进行过长期的残酷压迫。北京政府帮助西藏人民建设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项目,改善了卫生和教育制度。与一些新闻媒介宣传的相反,通过解决饥饿和贫困,中国在人民的生存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政府是有权威的,它强调社会富裕,反对无限制的个人主义。希望德国政府不要把与中国的关系当儿戏。”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上面的这些话从路德维希这位德国社会名流口里说出,在当时国际和德国的政治气候下是需要勇气的,其在国外的影响也是中方的任何宣传都难以替代的。不出所料,他这种主持正义的行动使自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几家报刊发文指责他,甚至发公开信,要求剥夺他科隆市荣誉公民称号。不久,在路德维希和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经过两国政府的努力,中德双方的关系又趋于正常化,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应中方邀请于当年11月访华,并决定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但参加开幕式,而且还为展品图册亲笔题词:“文化交流传佳话,中德友谊写新篇”。路德维希教授为促进中德友好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责任编辑 洪 文)

钱钟书英译“毛选”

● 王 冰

1950年,《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和出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主持下大规模展开了。

这次翻译对英语专家的要求是“名流”。“毛选”英译委员会的委员陆续定下了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陈振汉、陈逵和胡毅等人。这几人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是英文造诣最高的,每一个人都有留学英国或美国名校的经历,所获学位不是博士就是硕士,甚至有多个学科的学位。钱钟书的牛津B.doctor并不特别出众,但工作中他的才华很快就显出了锋芒,许多疑难问题经他解释,同事和助手们都很信服,有的即视为定论。

钱钟书

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结束,他几乎是“毛选”英译稿4卷本的最后审定者。

“毛选”英译委员会会址搬到城里堂子胡同,钱钟书只好住到委员会来,每周搭公交车回一趟家。堂子胡同的住宿条件比较差,委员们按年龄大小,有无孩子以及是否常住等条件安排宿舍,钱钟书刚届不惑之年,只能分在阴暗潮湿的平房中住下。翻译工作进展很顺利,到1951年4月翻译、校勘任务就已经完成。但有不少问题,一是工作效率不高,委员会讨论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方案,白白浪费了时间;二是委员们的水平参差不齐,翻译的风格各不相同,这些差异给统稿校勘工作留下了不少困难。

1951年7月,委员会宣布解散后,改名叫中宣部英译室,徐永煐还是主任,钱钟书留下了。英译室的任务是按照新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内容校勘译文。其工作内容和质量的要求并不低于委员会时的翻译和校勘。通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和了解,徐永煐对钱钟书的学问和为人都有了相当的认识,他知道只要有钱钟书在,翻译任务一定会圆满完成。钱钟书作为英译室唯一的委员开始了“毛选”英译稿的最后修订。从这时起,英译室的工作就围绕着钱钟书展开了。

1952年11月“毛选”第二卷全部译校完毕,送给胡乔木审阅,获得好评。1953年11月第三卷、四卷译本完成了最后的定稿。

当时毛泽东的文章大都已经翻译成了英文,钱钟书翻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篇章,主校、副校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等。

在委员会,他是唯一的一位文学家。一般人照这样推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有关文学和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论述,此篇文章译自钱手自是理所当然。由此以讹传讹,此说便成了定论。其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有英文译稿。

“毛选”英译三卷本获得了英国出版者的极高评价。在英译室时期,曾经聘请了一位英国顾问史平浩,他特别佩服钱钟书,虽然他在英译室只有半年的光景,但他对钱钟书的评价是“非常有才华”。当伦敦的出版者拿到第一卷译稿后,他们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更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译稿的评价是:“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而当二、三卷陆续寄到伦敦后,英国的出版者几乎未做什么改动就付梓出版了。

“毛选”前三卷在伦敦出版后,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人们不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思想,也从字里行间体验到了新中国的翻译水平。

(责任编辑 刘 文)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

张国华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来,他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包拯29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

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则。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

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失,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作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特权。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仁宗手里，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散、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这样,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唐介、吴奎等人,时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成为社会舆论中心。黄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显得很高兴,下旨赐每个僧

人紫罗一匹，众僧纷纷致谢。仁宗又走近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当时这些和尚们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赐僧，尚如此畏惧言官，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

针对这一现象，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约，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这一评论是到位的。

向陈腐势力斗争的典型代表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现是积极的，他的思想充满了改革的色彩，他进谏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种积极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东西，所以痛恨黑暗的东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净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秩列，所以对不干事的人大加弹劾。包拯上章弹劾宰相宋庠，说他当政七年，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说他固位无耻。其实，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国家重臣，没有政绩就是大过。听到这样的话，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独到的吏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即使现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处。

包拯把弹劾的矛头对准侥幸取巧的皇亲国戚张尧佐，对准胡作非为的宦官阎士良，对准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弹劾这些人物，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得罪他们，有时还会得罪皇帝，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包拯置这些于不顾，不避权贵。他说：“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实际做到“摧压横猾”、“大奸必摧” 的地步。包拯等人在诤谏、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个仁宗朝，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虽然受到某些优待，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阴谋弄权的地步。那些滥用权势，胡作非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谏官的弹劾，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受到限制。这同包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对这些势力有所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北宋整个一代，包拯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陈腐势力、危险倾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取得了较大成果，对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包拯对北宋政治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也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主导方面。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监司手中掌握实权，这种权力一旦被包拯这样立志为民干事的人所掌，就能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这也是包拯这样的人能做些有价值的事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

当然台谏对宋政治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评价。褒者认为宋之生命在台谏，抑制了不正之风；贬者认为台谏好生事，致使国无定。其实提高台谏官的地位，是皇权清明的表现，至于运用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由于仁宗处事摇摆反复，当谏官们言及他的“神经”或“心爱之物”时，仁宗也会采取相应措施，发一发皇威。史载，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进而攻击包拯好友谏官吴奎，这本是朝中派别的一场斗争，是弹劾张尧佐势力的继续。但应当看到，以包拯为首台谏官集体弹劾张尧佐，毕竟伤了仁宗皇帝面子，为了平衡政治力量，吴奎被外放。包拯给仁宗上了《请留吴奎依旧供职》疏，仁宗皇帝不予理睬，并讲，这是包拯等人朋党的大暴露。这表明仁宗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对包拯是不支持的，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经过再三考虑，包拯向仁宗提出请求外任。所谓求外任，其实是君臣之间处理失信关系的一种办法。从包拯的政治活动和情绪来说，以后三四年是一个低潮期，这期间仁宗皇帝对包拯的态度冷淡了下来。这种冷淡态度，在包拯政治活动上的反映是，这一时期他对现实政治的建议大大减少，似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

嘉祐三年（公元 1058 年），包拯升任右谏议

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为台官的首领。这个变动，说明仁宗还是想让包拯这样的人发挥点作用，这样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国。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包拯当御史台长官，对当时的政治是有所建议有所改革的，比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人们明显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显然不像当谏官时那样锋芒毕露，敢说敢为，无所顾忌。谏官包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史家认为，这时包拯的思想比过去来得更加平稳些。

任何皇权给予臣子的权力都有个限度，这个限度不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是依靠掌权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数几个未受到过大的政治冲击、未遭贬逐的官僚。纵观中国历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对现政权构成威胁，就是由于在实际权位上危及到了当朝的统治者。如与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屡遭贬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实干家。

包拯在北宋复杂的仕宦生涯中，总的说官运畅通，波折不多。这同他“犯颜抗谏”、“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个中原因值得特殊关注。

在所有论述中，张田评论可谓独到。张田是包拯的门生，包拯奏议集就是由他负责编纂的。他在这个文集题辞中指出，在先朝担任谏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这些人就升到侍从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独包拯，是进无他吝，天下又不得异议的人。这原因何在？张田以为，包拯一生忠于皇帝，尽力干事，尽管有时谏言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纳他的奏议；由于他刚直，不与人结成朋党，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党之争，免遭攻击；因为他办事公道，因而没有把柄被人抓住，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牵制。我们从张田的评论中似乎知晓了性格刚毅、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多于不信任与不支持的个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谏的方面，一般说来，君主起先导作用。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从历史来看，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纳谏的肯定。

实际上，“刚直、干事、干净”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得宠也好，失信也罢，他都会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可能是他给自己订下的最低标准。史家认为这也是仁宗对他进一步认识并再次任用的一个根据。包拯“刚直、干事、干净”当时就获得朝野多数人的赞扬。就连他的反对者也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尝言正次，闻于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旧时官僚一个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最大统一，自然与他长期坚守忠孝观有关，也同他“匡正阙失，尽心报国”的思想有关。

包拯的“退化”

包拯在仁宗朝从政20余年，当时改革之声到处充溢，包拯对社会改革的基本观点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之党”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并不时争斗一番。改革派与保守派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政治力量，两派斗争错综复杂。包拯虽同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却从不追随保守派或掺入派别活动，以自己的清心直道为处世原则，对政治的观点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在行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因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铺开。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包拯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进行改革，讲求实效，稳步推进。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过度张扬，更不喜欢发洋洋大论，他注重的是务实，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实际工作中。另外，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较，他明显地具有同情贫苦百姓的色彩，他一生为安民、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实事求是讲，包拯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相比，在宏观分析及把握上确实不及，但在求真务实方面则更胜一筹。过去评论包拯，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诤谏上，这是必要的，

但忽略了他以实干家身份促进改革的特点。

包拯一生实际受到仁宗的严重影响。仁宗对于台谏官的态度，时有变化，甚至采取压抑限制，这自然会给包拯带来制约。包拯在为官的后期，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他也担心过于得罪仁宗皇帝，过于得罪同朝的臣僚们，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据颜中其先生在《包公传》一书中转引陈无己的《后山谈丛》记载：在包拯升任枢密副使后，参知政事空缺，仁宗问谁可任此职。御史韩缜非常直率地说："包拯可以。"仁宗笑着说："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说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经发生了变化，同过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场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渐增长，这也可以讲是谏官包拯的退化。

事实上，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朕即天下，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从终极上大于制度，任何个人的进谏都难以始终如一，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火候，常常是难以保全其身。可以说，好的制度最终也难以突破皇权的制约。这不只是包拯退化，而是整个谏官队伍的异化，包拯不能把诤谏弹劾精神坚持到底，核心在于体制上的专制。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　锐	28.00	4.00
瓮中杂俎	廖沫沙	19.00	3.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	吴　江	11.80	3.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张湛彬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羡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羡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羡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之一　六月雪	牛　汉　邓九平	25.00	4.00
之二　原上草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之三　荆棘路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叶剑英同志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文革"十年中同林彪、江青的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的手法，客观翔实地记述了这场斗争的始末，展现出一代元戎的文韬武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70年党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无罪流放》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五七干校" 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五七干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我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特殊遭遇、再生与自我反省的一幕。书中有张光年、吴祖光、屠岸等66位知识分子的亲历告白，它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炎黄春秋》编辑部约稿启事

一、本刊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坚持爱国团结的政治宗旨；内容上继续拓宽领域，风格上再求多样。凡对促进爱国团结、促进改革开放、促进实事求是、促进百家争鸣有利的纪实性文章和极少量评论性文章均可发表。

本刊将以重要篇幅介绍对现实有积极借鉴意义的中共重要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介绍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国民党、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爱国人士（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人物）和相关事件；介绍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近代、现代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及有关事件；介绍清末民初倡导爱国、民主、科学、社会改革开放的人物及思想；介绍宋元明清各代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介绍我国科教、军事、文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医药、卫生等各领域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对中国社会有负面影响的帝王将相及军阀、政客和有关重大事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作适当介绍。

本刊还将介绍为我所用的外国历史题材，如某些国家在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环保建设、反腐倡廉等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与事件；介绍欧美反封建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社会改革开放的各种思潮及其人物。对中国文化、科技有重要贡献的欧美文人、传教士等也适当介绍。

本刊对当代各种人文题材将分别开辟《时代风》、《新视点》、《民族园》、《同心结》、《挚友情》等栏目予以反映。

本刊还将在“文荟苑”、“古镜台”、“遗闻录”、“九州景”等栏目中继续刊登谈古论今、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轶事旧闻，以及人文景观、自然景观、资料掌故等方面的文章。

特别希望热心支持本刊的专家、学者，在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各学会、研究会、地方志编委会等部门工作的人文历史工作者，参考上述约稿范围，踊跃赐稿。

二、投寄本刊的稿件，要求真实可靠，内容（包括细节）不可有任何虚构，文内重要引语、引用资料应注明出处。凡不是耳闻目见的重要题材，应将资料来源、有关事件出处、采访对象等在文后说明。因抄袭他人作品或因未注明资料出处而引发的著作权纠纷，以及因重大失实而引起的诉讼，由作者承担责任。

三、撰写在世人物的专题稿件，应请当事人看过，并签注意见。

四、作者投稿原则上应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作者投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不用的稿件一般不退。需退稿者，请附足邮资。投稿半年后未接到本刊采用通知，作者可对稿件自行处理。

六、本刊处理来稿时，尊重文章原意和风格，必要时将作适当删改。

七、来稿发表后，将及时寄去样刊和稿酬。

八、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龙源国际名刊网》全文数据库，刊发文章著作权的使用费已与本刊稿酬一次性支付给了作者。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　话：68534879
联　系　人：程理嘉　赵友慈

本期：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审校　赵友慈

2002/9 总第126期

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文宗田家英的少年时代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